

總第 **19**
JANUARY 2026

立野堂TM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 www.ZYD1998.com

策劃: 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中國民主黨主張：和平、民主、統一。

和平：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無論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還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之人。

民主：

民主是統一的政治大前提。祇有民主的統一才是兩岸人民的統一、是文明的統一、專制的統一，那是讓兩岸人民去流血喪命，是統治者的野蠻統一。

統一：

統一是我們努力的目的。和平民主的統一有利于增擴兩岸人民的自由、安全和發展空間。

但在和平民主統一的條件成熟之前，維持現狀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既要防止廢除中華民國的臺獨，也要禁止消滅中華民國的武統。維持現狀最重要的是臺海兩岸政府與人民承認對方國體、政體現實。杜絕相互打壓，增強互諒互信，這方面強勢的中國大陸尤其必須做出善意的表率。

中國民主黨關於《和平、民主、統一》，歷史上有過多次這樣的聲明與表述，我借此重申而已。

陳樹慶

2025 年 11 月 21 日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dvocates: Peace, Democracy, and Unification

Peac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fight Chinese people — whether they ar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inland 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Democracy: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political precondition for unification. Only a democratic unification represents the genuine will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reflects the ideals of a civilized union. A unification achieved through authoritarian means would demand bloodshed and sacrifice from people on both sides — it would be a barbaric unification imposed by rulers, not a union chosen by the people.

Unification:

Unification is our long-term goal. A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unification would expand freedom, security,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for peopl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before the conditions for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unification fully mature,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bes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We must oppose both the abol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nam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 military elimin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forceful unification." The most critical element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cknowledge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each other's state structures and governing systems. Mutual suppression must end;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this regard, the more powerful side — mainland China — must especially take the lead in demonstrating sincerity and goodwill.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as made multiple statements on Peace, Democracy, and Unific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What I offer here is a reaffirmation of that long-standing position.

Chen Shuqing

November 21, 2025

開篇 Prologue	01	
02	目錄 Preface	
在野黨簡介 Contents	03	
思想火種 The seed of ideas	05	
05-08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9-16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Truth China	17	
17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18-23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24-37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38	
38-40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41-52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53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54-55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檔案館 Archives	56	
56-59	迫害實錄 Persecution Records	
60	中國記憶 Chinese Memory	
雜誌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61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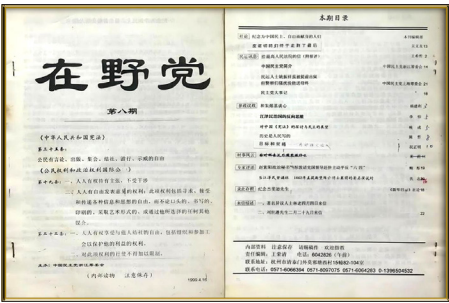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重压之下抬头的人

——专访许万平

采访：赵杰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许万平，重庆人，1961年生，是中国当代民间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累计刑期23年。自20世纪80年代末参与公共事务以来，他因持续从事与民主、政治改革相关的活动，多次遭到拘押与判刑。1989年之后，他因筹建民间政治组织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8年又被处以劳动教养；2005年再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其间长期服刑于重庆监狱系统，直至2014年获释。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中，许万平的个人经历几乎是一部中共政治控制史的缩影。他的口述不仅揭示了民间政治行动者在中共高度集权与高压维稳体制下的真实生存处境，也为理解中共如何通过司法体系与意识形态手段压制异议、塑造并限制公民意识，提供了罕见而重要的一手材料。

问：许老师，您能从最早开始谈起，您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逐渐走上追求民主道路的经历吗？

许万平：我最初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在印刷厂工作。那时候，我接触到的社会现象让我心生不满：官员腐败、权力寻租、靠关系和人情上位。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内心开始产生反抗心理，开始写一些反映社会不公的文章和意见。最初只是心理上的抗争，但后来，我发现仅仅思考和写作远远不够，于是我参与到广场上的集会和活动中。

问：您在广场上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许万平：我会参与演讲、写标语和公开信，也会帮助同学发放物资。在广场上，我表达了对社会不满和对公正的追求。当时我们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性的，但每一步都凝聚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问：六四事件发生时，您当时在做什么？

许万平：六四事件当天，我和家人吃过晚饭后，收听新闻联播，意识到中共的专制性质。那晚我非常震惊，但内心坚定了继续反抗的决心。我参与了相关行动，但不久就被抓捕，并被关押。

问：在监狱中，您经历了哪些情况？

许万平：监狱生活十分艰苦。手被反绑，睡在硬铁床上，几乎没有自由。除了身体上的限制，更可怕的是心理压力：每天都要参加所谓“政治学习”，承受精神上的威逼。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放弃信念，用坚强意志应对折磨。

问：您出狱后，加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这是您第一次正式参与组织工作吗？

许万平：是的。出狱后，我通过朋友联系，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开始参与组织和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写作和整理社会情况资料，包括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出狱初期面临不少压力，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不



接受妥协。

问：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权，您曾害怕过吗？

许万平：在八年监禁中，我接受了许多考验，但明确告诉自己不会退缩。出狱后，我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坚持写作和组织工作。威胁和压力始终存在，但我保持清醒和坚定。

问：监狱里是否有严重酷刑？

许万平：更多是精神压迫。身体上有些折磨，比如手被反绑，但没有极端虐待。高压环境主要是心理威逼，意图让我们屈服，但我没有被击垮。

问：能描述一下监狱生活环境吗？

许万平：非常艰苦。床是硬铁制，中间有铁杆，空间狭小。饮食简陋，几乎没有活动自由。监狱通过这种方式削弱人的意志，但信念是我最大的支撑。

问：在这种环境下，您如何保持信念？

许万平：我始终相信，坚持信念才有意义。即便身处最艰难的环境，我也没有屈服，而是用时间和耐心去应对各种压迫。活着就是本钱，活着就要坚持正义和信念。

问：出狱后参与筹委会，具体工作是怎样的？

许万平：出狱后，我参与组织筹备工作，在四川等地建立联系，整理资料，协调行动。初期困难重重，但我坚持原则，不向压力妥协，逐步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参与计划制定和宣传工作。

问：政府提出了哪些条件？

许万平：政府希望我不再参与某些活动，不在公开场合发声，甚至对个人生活提出安排。我拒绝任何干涉，但为了顺利出狱，做了一些不违背原则的妥协。

问：这些经历对您的人生和思想有何影响？

许万平：六四事件和监禁经历让我对民主自由有了深刻理解，也坚定了反抗专制的决心。它让我明白，坚持正义和自由是每个追求民主的人应承担的责任。

问：您在行动和写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许万平：我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整理社会各方面资料，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我参与组织建设，协调行动和宣传工作，记录历史同时推动社会民主发展。

问：总结来说，最重要的信念是什么？

许万平：活着就要坚持信念，继承为自由正义牺牲的人们精神。无论多大压力，坚持民主、反抗专制，是每个追求自由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问：许老师，您提到写作和整理资料，这些材料是否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

许万平：是的。我整理的资料被国内外研究者和民主人士引用，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我的文章和书籍在海外刊物发表，引起一定关注，也为国内外了解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参考。

问：在组织建设上，您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许万平：最大的困难是政府的打压和内部协调。成员经常被监控、拘留，有些人不得不退出，这对组织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人在策略和理念上存在分歧，需要耐心协调。

问：您如何处理内部分歧？

许万平：主要通过沟通和共识达成。我强调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即推动民主和法治。遇到不可调和的分歧，也会尊重个体选择，但组织核心原则不妥协。

问：您是否有后悔过走上这条道路？

许万平：从未后悔。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正义和自由是无法用舒适生活交换的，如果放弃信念，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将失去意义。

问：您如何看待社会上的冷漠和恐惧？

许万平：理解，也遗憾。在高压环境下，许多人选择沉默和自保，这是本能。但这也是为什么坚持公开发声、记录历史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而放弃责任。

问：出狱后您如何保持安全？

许万平：采取了谨慎措施，避免直接与高风险人群接触，注意行踪和通讯安全。但我不畏惧威胁，坚持行动的同时保护自己和家人。

问：您认为民主运动的下一步应该如何推进？

许万平：需要两个方面：第一，提高民众认知，让更多人理解自由与法治的重要性；第二，坚持行动，尤其是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改革。历史证明，任何暴力或极端行为都不利于长期民主建设。

问：在海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许万平：海外经验在组织建设、宣传方式、法律援助等方面非常宝贵。尤其是如何利用媒体、社会资源和国际舆论，推动民主理念的传播，这是国内运动可以借

鉴的。

问：您如何看待现代网络技术对民主运动的作用？

许万平：网络技术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让信息传播更快，更广泛，有利于教育民众、组织行动；另一方面，它也容易被监控、操纵。因此，使用网络必须谨慎，确保信息安全和传播效果。

问：您是否考虑过离开国内生活？

许万平：曾经考虑，但最终决定留在国内，继续行动。离开可能更安全，但对推动民主和影响社会有限。留下来才能真正承担责任。

问：在您看来，哪些品质是民主斗争者必须具备的？

许万平：坚定信念、耐心、勇气和智慧。面对压力和威胁，能够冷静判断，长期坚持，不因短期利益或恐惧妥协。同时要善于团结他人，形成合力。

问：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寄语？

许万平：要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理解自由与权利的价值。遇到不公时，要勇敢表达和行动，但方法要理性、和平。历史需要他们继承和延续正义精神。

问：许老师，您在多年经历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

许万平：有很多，但印象最深的是几次大规模行动被镇压。那种感觉非常震撼，让人清楚意识到现实的压力和风险，同时也坚定了继续行动的决心。

问：面对这种风险，您是如何心理调适的？

许万平：一方面依靠信念：相信追求自由与正义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注重日常生活的规律和安全措施，让自己保持理智和冷静。家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问：您怎么看待外界对您行动的评价？

许万平：评价各有不同，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我理解批评，但不会因此改变原则。行动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正义，不是取悦他人。

问：您如何看待国内政治改革的前景？

许万平：改革是长期过程，需要社会各界耐心推动。短期内可能进展缓慢，但历史的趋势不会倒退。关键是要培养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民主理念，为未来积累力量。

问：您是否参与过与海外组织的合作？

许万平：有的。主要是在信息共享、研究交流、策略讨论方面。合作必须谨慎，避免暴露核心成员和行动计划，同时也让国内运动获得更多参考和支持。

问：对于信息安全，您有什么建议？

许万平：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要随意使用未加密的通讯工具，避免泄露个人身份和组织信息。网络行动要经过严格规划，确保安全。

问：您曾经多次被拘留，对法律制度有什么看法？

许万平：现实法律制度存在局限，尤其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但法律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如果公

民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制度会逐步完善。

问：您在受压环境下，如何保持行动力？

许万平：关键是明确目标和价值，不被恐惧和压力左右。同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互相激励，共同前行。

问：您是否考虑过将自己的经验系统化、写成书籍？

许万平：考虑过，也已经开始整理部分材料。这不仅是在记录历史，也是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和启示，让民主理念得以延续。

问：您如何看待媒体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

许万平：媒体是桥梁和监督工具。它可以让社会了解真相，传播理念，也能形成舆论压力。关键是媒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直接影响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问：对未来的社会变革，您有何期待？

许万平：期待一个自由、法治、公正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平等表达意见，权利得到保护，社会资源公正分配。虽然道路艰难，但这一目标值得长期坚持。

问：您如何看待历史对个人的评价？

许万平：历史是公正的。无论当下如何评价，坚持正义的人最终会被认可。重要的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追求短期名誉。

问：对于年轻的民主推动者，您有什么实际建议？

许万平：首先要学习历史、法律、社会知识，增强理论基础；其次要注重实践经验，从小行动开始，逐步扩大影响；最后保持心理和行动的平衡，避免冒进。

问：许老师，您在组织行动时如何处理内部分歧？

许万平：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我倾向于通过理性讨论解决问题，确保每个人的意见都被听到，同时坚持核心目标不动摇。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策略上可以灵活调整。

问：您认为社会动员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许万平：主要是体制压力和信息封锁。同时，民众的观念也需要时间转变。很多人害怕风险，不愿公开参与，这是现实阻力的一部分。

问：在行动中，您如何平衡安全与传播效果？

许万平：必须先保证安全，否则任何行动都会失败。在传播效果上，可以通过安全的渠道、分层次信息公开和长期策略来实现，不必追求短期轰动。

问：您如何看待国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

许万平：国际关注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提供压力和支持，弊在于可能被政治化或误解。国内运动应以自身实际为主，不完全依赖外部力量。

问：您觉得社会教育对民主意识的培养有多大作用？

许万平：至关重要。教育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 and 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法治意识的人，很难理解民

主和自由的意义。

问：在长期斗争中，您如何保持信念？

许万平：信念来源于价值认同和历史责任感。我相信正义最终会被承认，这种信念比个人安危更重要。同时，通过小成果获得鼓励，也能增强动力。

问：您认为行动与舆论的关系如何把握？

许万平：舆论是行动的延伸，但不能完全依赖。行动要符合现实条件，舆论则作为宣传和引导工具。两者相辅相成，但必须分清主次。

问：在经历挫折后，您如何调整策略？

许万平：首先分析原因，找出可改进之处；其次调整计划，确保下一步更加安全高效；最后维持团队士气，让每个人都能继续前行。

问：您如何看待社会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差异？

许万平：差异很大，有的人完全不了解，有的人意识到但不敢行动。教育、信息传播和实践机会是弥合差距的关键。

问：对于国际舆论中的误解，您如何应对？

许万平：保持沟通和解释，但不纠结于所有误解。重要的是让关心者了解核心事实，让支持者有明确判断依据。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

许万平：我只是一个行动者，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角色重要，但不是自我中心，关键是推动整体运动前进。

问：您是否有后悔的时刻？

许万平：后悔很少，因为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可能会对方法选择有所反思，但从目标来看，从未后悔。

问：在行动和家庭之间，您如何平衡？

许万平：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基础。我尽量把行动安排得不影响家庭，同时与家人保持沟通，让他们参与安全决策。

问：未来的行动中，您会有什么调整？

许万平：会更加注重安全、策略和信息化，同时加强团队培训和心理建设，确保行动可持续且高效。

问：最后，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寄语？

许万平：保持独立思考，坚持原则，同时学会策略和耐心。社会变革不是一蹴而就，长期积累力量才会产生真正影响。

问：许老师，回顾整个行动历程，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许万平：最大的感受是责任感和坚持的重要性。每一次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叠加起来才形成整体影响。看到团队成员的成长和民众意识的提升，是最值得骄傲的部分。

问：在整个过程中，您遇到过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

许万平：最困难的是在高压环境下保持信念，同时

保护团队安全。有时候必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艰难选择，这种压力几乎无时无刻不在。

问：您如何看待未来社会变化的可能性？

许万平：社会变化总是缓慢而曲折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的积累最终会推动制度改进。我相信长期来看，正义和合理的制度会逐步得到认同。

问：您觉得自己的经历对年轻一代有何借鉴意义？

许万平：年轻人应该理解责任与实践的重要性，不只是口头上的理念。要敢于思考、敢于行动，同时保持耐心和策略。理论与实践结合，才可能产生真正影响。

问：您认为民间力量在社会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

许万平：民间力量非常关键，它是制度改进和社会觉醒的基础。尽管力量有限，但通过长期积累和协作，可以形成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问：对未来的行动者，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许万平：要有战略眼光，注重安全和团队协作，同时提升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保持信念，但不能盲目乐观。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问：在采访的最后，您希望公众记住什么？

许万平：希望公众明白，坚持原则和责任感的重要性。无论环境多么艰难，理性和正义最终会找到生长的空间。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思考。

编者按

在许多人的一生里，“历史”不过是课本上的字句和老师板书的年号。对许万平来说，历史是铁窗里的寒夜，牢房里那根冰冷的铁床，是每一次被扣押、每一次被威胁的日子里沉甸甸的呼吸。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开始，走进街头，走进集会，写下标语、发出声音，而带来的是多次被拘押、劳教、判刑，累积了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活。中共的高压与专制如同冬日里不断落下的霜雪，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可他没有低下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权力可以被无限集中，异议可以被系统镇压，公民的权利可以被一点点剥夺，却无法掩灭人的意志。

这次访谈记录的，是他在铁窗监狱、在高压日常中挣扎的故事。有宏大的政治事件的轰鸣，也有夜深人静的恐惧与痛苦；既是专制政权的冷酷，也是个体的坚韧与智慧。

我们刊发此文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如何在独裁下活着、思考、记录，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被高墙与沉默遮蔽的年代。理解许万平，也就是理解那个被权力压抑、被恐惧笼罩的时代；保存这些声音，是对压制的见证，是对公民权利的呼唤，也是记录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党历史的重要篇章。

Those Who Raise Their Heads Under Heavy Pressure • An Interview with Xu Wanping

This interview documents the life, imprisonment,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s of Xu Wanping, a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born in 1961 in Chongqing. His personal trajectory mirrors the experience of many independent civic actors under long term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Over several decades, Xu was repeatedly detained, sentenced, and incarcerated for his involvement in democratic advocacy and political organizing, accumulating a total of twenty three years in prison.

Xu began as an ordinary factory worker during the reform era of the 1980s. Exposure to corruption, privilege, and systemic injustice gradually awakened hi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His initial resistance was quiet and intellectual, expressed through writing and discussion. Over time, he moved to war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speeches,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s calling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reform. These activities soon placed him under surveillance and led to arrest.

After 1989, Xu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offenses. Continued civic engagement after his release resulted in further punishment, includ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1998 and a twelve year sentence in 2005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Most of his imprisonment took place within the Chongqing prison system.

Xu describes prison as an environment designed to destroy personal autonomy and moral independence. Daily life involved forced political study, constant monitoring,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imed at obedience rather than rehabilitation. Living conditions were harsh, marked by overcrowding, iron beds, limited food, and the systematic erosion of dignity. Despite this, Xu refused to abandon his beliefs or cooperate with ideological coercion.

Maintaining inner discipline became essential to survival. Xu emphasizes that fear was ever present, but submission was a choice he consciously rejected. After his release, he joined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continued docu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work under persistent state pressure.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Xu avoids heroic self portrayal. He stresses caution, nonviolence, and long term civic responsibility. Democratic change, he argues, depends on memory, endurance, and the refusal to internalize fear. His story shows that even under extreme pressure, some individuals continue to raise their heads and remain accountable to conscience and hist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橡皮筋做的笼子能否关住权力这猛兽？

作者：陈树庆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在法治社会，制定法律，建立权力制衡制度，保障人民监督权，目的是将权力这一猛兽关进牢笼，在充分发挥权力服务于社会的同时，有效防止滥用权力，确保这猛兽不能伤害民众的自由和权利。

把权力比作猛兽，把法律、制度和人民的监督权比作笼子的说法，早在2004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讨论国家安全与权力时，使用了“Power is a formidable, awesome beast”（权力是可怕、令人敬畏的野兽），在他随后的一次演讲中，更为精彩：“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2013年1月22日，刚履新职不久的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有关反腐的讲话中，也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随后的十几年来，无论习的讲话还是其他官方文件，“把权力关进笼子”一直在反复强调。实际效果如何呢？官方宣传与民间舆论众说纷纭，对我自己而言，亲身遭遇的感触与思考，才是最为深切的。

2025年12月25日上午9点刚过，我接到0571-87882793电话，电话那头是12月17日我在香积寺路58号拱墅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退休手续时，接待我的105室工作人员陈明朋，说他才知道我在12月4日已经向大关街道提交了办理退休的申请，而且他现在也已收到了我向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说我所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他让我过去拿。我答应马上过去，在上午10点不到就赶到了他那里，拿了几份材料，其中有一份盖着“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一份制作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浙人社函[2010]358号-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等。

看了这些材料，我既失望，又高兴。失望的是，《告知书》明确以“不符合政策”的原因，否定了我社保缴费24年4个月已经超出15年最低缴费要求可以领养老金的申请，只确认我“合法有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9年10月”，看来我要现在就领养老金，难！

高兴的是，《告知书》所依据的法律及政策明显适用不当或效力不足，为我接下来的维权铺开了伸展的余地。

本案的事实是，我陈树庆、家属、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为我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我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拱墅区社保经办机构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顺顺利利，现在要其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相关政策”为托词，拒不履行其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由此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利益能否得到保护，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政府是否可以随意违约？

不难发现，近几十年来，政府违约的案例屡屡见于舆论。如果政府可以随意违约，显然会让民众面对政府不能预期、无所适从，担心政府的权力会像野兽吞噬自己的权利。虽然每一个案子政府方对于自己“言而无信，约而不守”总是有一定的“理由”来说辞，但其“理由”必须经得起严格的法律限制，本案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拒绝为陈树庆现在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所依托的“相关政策”是否也站得住脚呢？本文不妨展开初步的分析如下：

本案的法律关系由两项事实构成，第一项是缴纳社保，其中包括服刑期间缴纳的是否有效？陈树庆、就业单位等是缴费义务人，政府（社保经办机构和财税机构）是收费权利人；第二项是到了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陈树庆变成了领取权利人（受益人），政府变成了社会保险支付的义务人。该行为由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法定授权履行政府的社会保险管理与服务职责，既有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又由于该行为的整个过程由民事主体陈树庆一方和行政主体社保经办机构一方共同完成，类似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合同”。如果社保经办机构主张第一项事实陈树庆一方缴纳10年6个月刑期间的社会保险无效成立，那么本案《告知书》上认为陈树庆只剩下9年10个月的有效缴费期也是确立的；如果陈树庆认为己方缴纳社保包括刑期内的都有效，本案《告知书》认定就是错误的，代表政府方的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应该立即替陈树庆办好退休手续并按发放法定与约定的养老金。

现代法治社会是“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对民众

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如果主张作为民众陈树庆一方缴纳刑期内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无效，就必须指出其“法”之所“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就有类似的规定，在《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的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实作为“无效”前提。

从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提供的《告知书》中可见，其推翻约定拒不履行对陈树庆的社会保险责任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浙人社函[2010]358号）等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服刑期间参保属于违规参保缴费，该期间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当清退。

显而易见，上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包括《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里的规定，是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缴纳社会保险费，立法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里面并没有“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浙人社函[2010]358号《复函》，是（此件依申请公开），根据法律未经公布不生效的原则，“依申请公开”不能等同于“公布”，没有对抗不知情相对人的任何效力；《复函》做出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印发日期是2010年10月9日，对我在2010年9月13日已经结束的第一次服刑四年期间缴费显然没有追溯效果；更何况《复函》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级别和效果，属于无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替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制定的“比赛规则”，里面所指的“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明显属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9条将典型的关于行政主体“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之“第二，减损权利或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也不能作为政府自己违约的依据。

陈树庆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享受退休的资格与待遇，除了前述实际已缴费的年限及对政府信赖利益

保护原则以外，没有任一现行法律的条款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享有社会保险。而在对陈树庆的两次判刑的判决书中，判决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判决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当然包括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陈树庆并不因其服刑就成了“人人”之外，应该享有社会保险。

更何况，本案如果进一步展开下去，还牵涉到中国监狱普遍的对犯人强制无偿劳动的问题。本案原告陈树庆第一次坐牢期间自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共计2年零8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六分监狱七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菜班组进行菜肴初加工2年5个月；第二次坐牢期间自2017年1月至2025年3月共计8年2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三分监狱六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面食组烧制犯人主食7年11个月。两次坐牢期间不算第一次坐牢看守所里的零星劳动，实际参加监狱劳动累计10年10个月，所以，根据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禁止”；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享有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同工同酬之权利，不容任何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任何人不得使充奴工”的相关规定。按照这些国际法的要求，即使监狱犯人依法判决并以改造为目标的服“苦役”，也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应的同工同酬及社会保险接轨。如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我国政府能够遵守这些宣言与公约，将我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应有的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障予以考量和贯彻，即使我自己及亲朋好友工作单位替我服刑期间的缴费不算，也够15年以上办理退休的资格与相关手续。

当然，政府遵守已经签署、甚至有的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不仅是法治社会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得“公序良俗”。

综上，无论是《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的抽象行政行为，还是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处理陈树庆退休事宜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了让行政主体可以“约而不守”，对自己的权力做出了超出法律规定的扩张性理解，对民众的权利做出了法律规定以外的压缩性诠释，法律在他们眼里于己于人双重标准，成了权力随意拿捏、对别人可紧、对自己可松的橡皮筋，而非可以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刚性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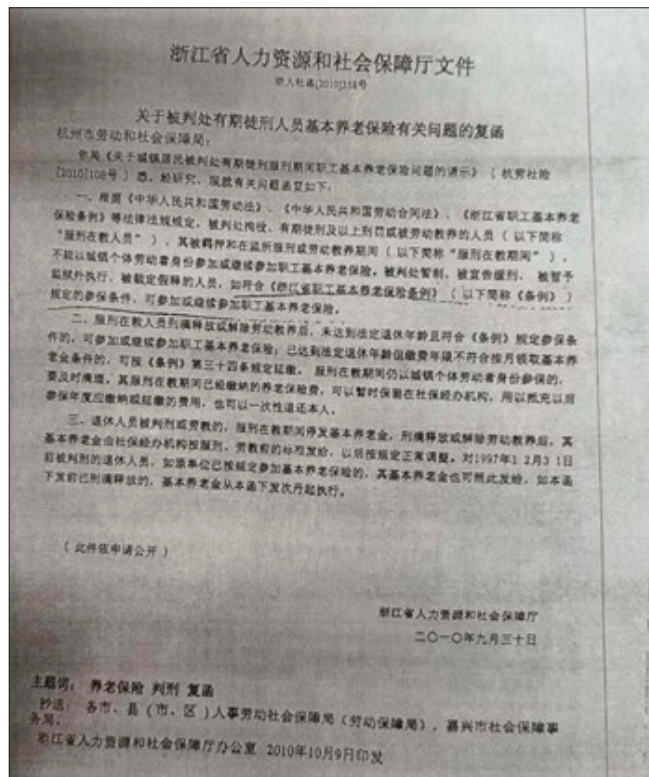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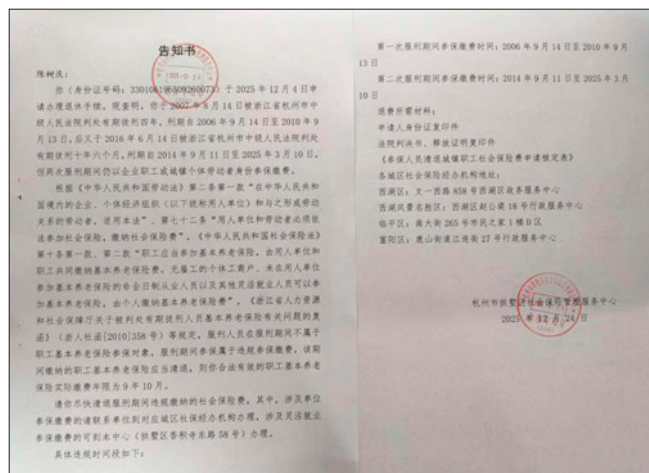
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9条将行政主体“减损（行政相对人）权利或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的行政行为”认定为“没有法律依据”。接下来，我不妨探究司法这一权力制衡的“笼子”，在实践中是否足够刚性与坚硬，能不能关住行政权力这一“猛兽”，拭目以待！

附：

一、盖着“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

二、《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浙人社函[2010]358号。

2026年1月2日 完稿于中国杭州



Can a Rubber Band Cage Restrain the Beast of Power

This article asks whether power can truly be restrained when the legal cage designed to confine it is elastic rather than rigid. Through a detailed personal pension dispute, the author examines how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often expands beyond lawful boundaries while individual rights are narrowed through selective policy interpretation.

The metaphor of power as a dangerous beast and law as its cage is widely accepted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In a rule of law system, legislation, 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public oversight are meant to ensure that power serves society without harming citizens. However, when rules are applied flexibly for authorities and strictly for individuals, the cage becomes a rubber band rather than steel.

The article centers on the authors attempt to claim retirement benefit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four years of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Despite long term payments, including periods during imprisonment, the local social insurance authority abruptly denied eligibility. The rejection relied on an internal policy letter claiming that contributions made during incarceration were invalid, even though the same authority had accepted these payments for years without objection.

The core issue is the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 When a government repeatedly accepts contributions, citizens reasonably rely on the promise of future benefits. If authorities later repudiate obligations without clear legal basis, trust in law collapses and power becomes arbitrary.

Legal analysis shows that neither national labor law nor social insurance law explicitly prohibits incarcerated individuals from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insurance. The policy letter cited lacks legislative authority, was not properly promulgated, and cannot override statutory rights. Criminal judgments deprived the author of liberty and political rights, not economic or social security rights.

The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compulsory prison labor and the absence of corresponding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s, raising concer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recognizing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when law is treated as a stretchable tool rather than a binding standard, power escapes its cage. Whether the judiciary can impose real limits will determine if the cage is firm, or merely a rubber ban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信用破产 官媒处处翻车

作者：国内来稿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5年12月12日，当某国《人民日报》头版打出“钟声”那句“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坚决捍卫和平与正义！——随时待命”的口号时，某位独裁官僚本人或许以为又是一次成功的全国总动员。结果，只用了不到90分钟，评论区就彻底沦陷了。

“高市早猫都敢公布财产了，你们敢吗？我代表14亿人民向你们下战书！”

“谁要是敢鼓动打仗，我就先把他定点清除，谢谢。”

“发我一支枪，我现在就去机场，保证一个熟人都不放跑。”

“兰兰，护照和美元准备好了吗？”

“喝酒吃肉不喊我，打仗喊我拼命？对不起，我手机没电了。”

这些评论不是出现在推特、不是出现在YouTube，而是在《人民日报》自己的APP底下，在实名制、绿码、铁腕控评的最后一块阵地里，堂而皇之地挂在热评前十，点赞几十万，删都删不完。

这已是本周第三起大型翻车事故：国防部抖音号那条“全民皆兵”视频，评论区直接变成“领导子女先上”的接力赛；

共青团中央那句“把青春融入强国强军”，被顶成“先把北京户口融入我青春”；

连新华社英文账号发的一条“China is ready”（中国准备好了）的推文，都被海外华人刷成了“Ready to run”（准备好逃生）。

过去十年，官媒翻车是偶发事件；如今，官媒不翻车才是新闻。翻车的不只是账号，而是整个以土皇帝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那套个人信用体系彻底崩盘。

老百姓发现：喊“共同富裕”的，从来不公布自己家庭财产；

喊“清零”的，自己家人第一时间润去新西兰；

喊“准备战斗”的，子女早就在美国读博士后；

喊“敢于斗争”的，从来没让自己的孩子上过前线。

当土皇上的每一句谎言、每一个手势、每一篇“钟声”，都被现实生活生生地打成反讽，人们就不再恐惧，

也不再表演了。他们用最狠的段子、最冷眼神、最决绝的“躺”，公开宣判：这个人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了。

当《人民日报》的评论区都敢明目张胆地喊“守机场”，当“兰兰”成了全国人民心照不宣的暗语，当每一次官方动员都以史诗级翻车告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宣传失灵，而是整个统治合法性的末日倒计时。

当极权社会信用破产的日子，官媒翻车的每一声巨响，都是人民在用最中国式的方式，给独裁政权敲响的末日丧钟。

Credit Collapse: State Media Failures Everywhere

This summary examines a recent credibility breakdown in Chinese state media following a December 12, 2025 mobilization message urging people to prepare for struggle. Intended as a show of resolve, the message instead triggered widespread ridicule inside the outlet's own app. Within minutes, highly upvoted comments mocked war rhetoric, questioned officials' sincerity, and highlighted the gap between elite privilege and demands on ordinary citizens.

What makes this moment notable is that the backlash occurred under strict censorship, real name systems, and heavy moderation. Similar reversals have appeared across defense, youth,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paganda, turning official slogans into satire. The pattern suggests more than communication failure. It reveals a collapse of political credibility. When fear no longer compels obedience, propaganda loses its force. Public mockery becomes a signal that legitimacy itself is eroding, and official mobilization now produces the opposite of loyal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

作者：郭泉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川普逻辑》之15：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非法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部和战争部立即开展工作。战争部更新军事指令，纳入芬太尼化武威胁，下令动用“一切打击化武扩散的战争工具”对付毒贩。昨天（美国时间12月15日），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非法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举将芬太尼危机从公共卫生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威胁，授权军方及情报机构强化打击毒贩行动。以下是核心要点：

一、政策内容

1. 定性依据

行政命令强调，芬太尼因极强毒性（仅2毫克可致命）和大规模致死性（川普总统称每年致美国乃至全球20万-30万人死亡），被定义为“更接近化学武器而非毒品”。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定义为可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化学、生物等武器。

2. 行动措施

美国情报部门：将重点开展跨境毒品供应链监控、犯罪网络情报共享及军事协同打击行动。

A. 情报工具：升级启用原用于追踪武器扩散的技术手段（如卫星侦察、金融交易监控），深度渗透国际贩毒网络，重点锁定原料来源、制毒工厂及运输路线。

B. 跨机构协作：强化与五角大楼建立实时情报共享机制，为军方在加勒比海、太平洋等区域的打击行动提供目标定位支持（2025年9月以来已发动20余次袭击）。

C. 扩大境外行动权限：依据行政令授权，可对川普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级毒枭集团实施网络攻击、人员渗透等主动干预。

司法部：加强对毒品走私的调查、起诉和判刑。

战争部：评估执法支持需求，下令更新军事指令。纳入芬太尼化武威胁，允许动用“一切打击化学武器扩散的战争工具”对付毒贩。

财政部与国务院：打击资助毒品走私的资产和金融网络。

国土安全部：协同战争部强化边境管控，将芬太尼走私定为“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扩大军事授权：美军可对加勒比海、太平洋等地区疑似贩毒船只发动攻击，此前已认定部分贩毒集团为“外国恐怖组织”。

以下是我根据调查数据和开源资料，对芬太尼来源



地的一些分析、判断和建议。

二、核心事实

1. 涉案人员及判决

武汉精奥生物科技公司高管王庆州（音译，Qingzhou Wang）因非法进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及洗钱罪，被美国法院判处25年监禁；市场经理陈依依被判15年监禁。二人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将数百公斤芬太尼前体伪装成狗粮、坚果等日用品走私至美国，形成“伪装运输-跨境交付-匿名收款”链条。

2. 走私手法

通过官网宣传“突破23国海关的狗粮伪装技术”，声称“99%能通过美国海关查验”。实际运输中，芬太尼前体被封装在印有狗粮标识的容器内，利用空壳公司、离岸加密货币账户洗钱。

3. 中美执法冲突

美方采用在斐济“钓鱼执法”诱捕中国公民犯罪分子王庆州和陈依依，中方批评此举属“任意拘押”和“长臂管辖”。中方强调：涉案部分前体化学品不受国际公约及中国法律管制，且中国自2019年起实施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已建立严格管控体系。美方表示：该国管控不严，致使“跑风漏气”。你管不好，我就来帮你管。犯我美利坚者，虽远必诛。美方认为中方未彻底切断供应链，中方则指出美方忽视自身禁毒责任，双方合作机制存裂痕。

三、事实依据

1. 供应链路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芬太尼前体生产国（占原料供应量65%-70%），中国的芬太尼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标签、夹藏于合法货物等方式将芬太尼前体运往墨西哥。墨西哥贩毒集团（如锡那罗亚集团）利用其加工成芬太尼，

再经美墨边境走私至美国。

2. 执法数据

2024年9月至今，美国在西南边境查获的芬太尼中，98%与墨西哥贩毒集团相关（DEA报告）。2025年9月查获的300吨前体化学品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同类案件，直接溯源至中国出口商。

3. 中国政策与争议

中国自2019年5月起对芬太尼类物质实行全球最严整类列管，并强调从未直接向美国走私芬太尼。但美方多次指控中国对前体化学品流向监管不足，中国犯罪企业正在通过隐蔽渠道供应墨西哥黑市。

最后我建议，中美应联合建立打击非法芬太尼生产和走私的情报、警察和军事战争组织。人类必须打赢芬太尼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关乎文明存续。芬太尼泛滥不仅是毒品问题，更是对人类治理能力、国际合作底线及社会韧性的终极考验。若无法遏制，将重演历史悲剧，摧毁经济根基、瓦解社会秩序、引发人道灾难。

看看吸食芬太尼的那些“僵尸”吧，那就是地狱的景象。走私、贩卖芬太尼的人就是魔鬼。基督精兵、上帝之军，川普总统，加油！泉史公曰：川普仁君，颁令列芬太尼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实为护国安邦保民之壮举，兹作赋《芬太尼诛》以颂：夫芬太尼者，毒逾蛇虺，害甚刀兵。二毫克夺命，十粒盐潜形。年戕生民廿万，岁损邦本干城。幸有川普总统，明察如炬，颁令如霆：列此物为大规模杀伤之器，举国策以剿毒瘴之腥！

护国之策有三：一曰刑狱加峻。司寇严讼，罪加贩运之徒；二曰金流尽斩。户部封资，断其财源之径；三曰兵甲协剿。戎机联策，荡平巢穴之嶂。更谕寰宇诸邦，共遏毒流之横。总统慨言：“此非毒也，实乃化武之猱！”川普剿杀芬毒，实乃安邦大义也。昔禹疏九河以定九州，今公诛芬毒而安兆姓。昔者周公吐哺，唯恐贤士不归；今者元戎沥血，但求生民无病。截毒丸三百万于国门，降祸患半百成于边境。解倒悬于既溺，固金汤于将倾。此令既行，家国得守，山河可宁！泉史公赞曰：毒雾弥天，幸有利剑破昏霾；仁政护土，终教日月复清明。后世青史昭彰处，必铭此令卫苍生！



Fentanyl as a Weapon Chemical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recent executive order sign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at classifies illegal fentanyl a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rather than a conventional narcotic. The order reframes the fentanyl crisis from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to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authorizing intelligence,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and financial agencies to use expanded counterproliferation tools against drug trafficking networks.

The policy rationale rests on fentanyl's extreme lethality and mass casualty impact. With as little as two milligrams capable of causing death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taliti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wide, fentanyl is described as closer to a chemical weapon than a drug. Under this framework, agencies are directed to treat fentanyl supply chains similarly to chemical weapons proliferation networks.

The article outlines concrete measur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re tasked with intensified surveillance of cross border supply chains, including 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financial tracking, and deep infiltration of transnational criminal network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 instructed to update military directives to incorporate fentanyl as a chemical weapons threat and to employ all available tools used against chemical weapons proliferatio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reasury, State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ordered to expand prosecutions, asset seizures, sanctions, border enforcement, and overseas operations. Certain trafficking groups are designated as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enabling cyber operations and kinetic interdiction, including maritime strikes in the Caribbean and Pacific.

The text presents factual cases to support the policy shift, including U.S. court convictions of Chinese chemical company executives for trafficking fentanyl precursors and laundering funds through cryptocurrency, as well a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smuggling methods such as disguising precursors as dog food or consumer goods. It highlights ongoing U.S. China disputes over jurisdiction, precursor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responsibility, noting that while China claims strict controls since 2019, U.S. authorities argue that regulatory gaps continue to feed Mexican cartel produc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entanyl trafficking constitutes a civilizational threat. It calls for joint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police,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to defeat what it frames as a global war on fentanyl, warning that failure would undermine social order, economic stability, and human secur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社会养老保险与政府的公信力

作者：陈树庆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早在两千多年前，《史记李斯列传》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了“以吏为师”的典故，讲的是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政府工作，无论是社会道德，还是执行国家的法令，应做全社会的表率，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无信不立”！按照现在的说法，政府要有公信力，尤其在处理老百姓的各种日常事务中，应确保民众对政府信赖利益的保障原则。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关联着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信誉与权威。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者、推行者和最终责任承担者，其政策的连续性、执行的透明度以及承诺的兑现程度，都深刻影响着民众对制度的信任度，进而构成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基石。

当政府能够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健运行，通过公平的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参保人员的合理权益，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让公众清晰了解政策内容与资金流向时，民众便会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责任担当产生积极认知，这种认知转化为对政府的信任，促使社会形成可靠的预期和良好的秩序。反之，若养老保险政策朝令夕改、执行过程中官吏们凭借“根据相关政策”的一句笼统托词，可以言而无信、约而不守，或基金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支付能力受质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会受到冲击，引发对公共政策的普遍疑虑，小到民众的生活，大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就失去指望，所谓的礼崩乐坏、法制颓废和无可救药了，往往从此得以萌生与蔓延。

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正向互动关系，前者的完善是后者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后的坚实则为前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本文作者陈树庆，就自己在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时所遭遇的情况进行维权，不妨就政府公信力这个问题，首先撕开一层面纱：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至2025年12月17日，申请人陈树庆已达法定退休

年龄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2025年12月17日上午9时许，申请人到贵局（拱墅区人社局）设在拱墅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办公场所办理退休手续，办事人员以陈树庆曾经因遭200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和2016年“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6个月为由，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剩余缴费年限只有九年多，不足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拒不办理申请人的退休资格，只是一味要求申请人对服刑期间已交的社会保险先行退费。

由此，申请人产生两项疑惑并提出相应的两项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一、20多年来，申请人、申请人家属、申请人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申请人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贵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这其中就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贵局在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贵局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相关政策”为托词，拒不履行贵局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让申请人对政府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顿生疑惑。为此，申请人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是：服刑期间已经缴纳社保的期限无效并退回缴费的具体法律（包括政策）依据，包括法律（政策）的具体名称，第几条第几款。当然，答复函中对这些法律（政策）的内容予以清晰载明，则更好。

二、贵局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让申请人先退费，口头答应退费后才能续办申请人退休资格和待遇的其他审定工作，申请人认为，退完刑期内的已缴费社保费用，剩余期限已远远不足办理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届时申请人不仅现在办不了退休，连接下来的现实经济负担和最终养老社会保险结果也是无从确信和依托。为此，申请人提出的第二项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是：1、具体退费流程，根据缴费人不同而确定的不同缴费时段，各时段具体退费数额（或退费内容与计算标准）；2、退费完毕后的详细善后流程与结果预判，同时注明所依据的法律（政策）的条款及内容则更好。

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恳请贵局以书面的形式

具体明确答复，请求不要再派员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及可以不认账、不负责任的任何口头“咨询”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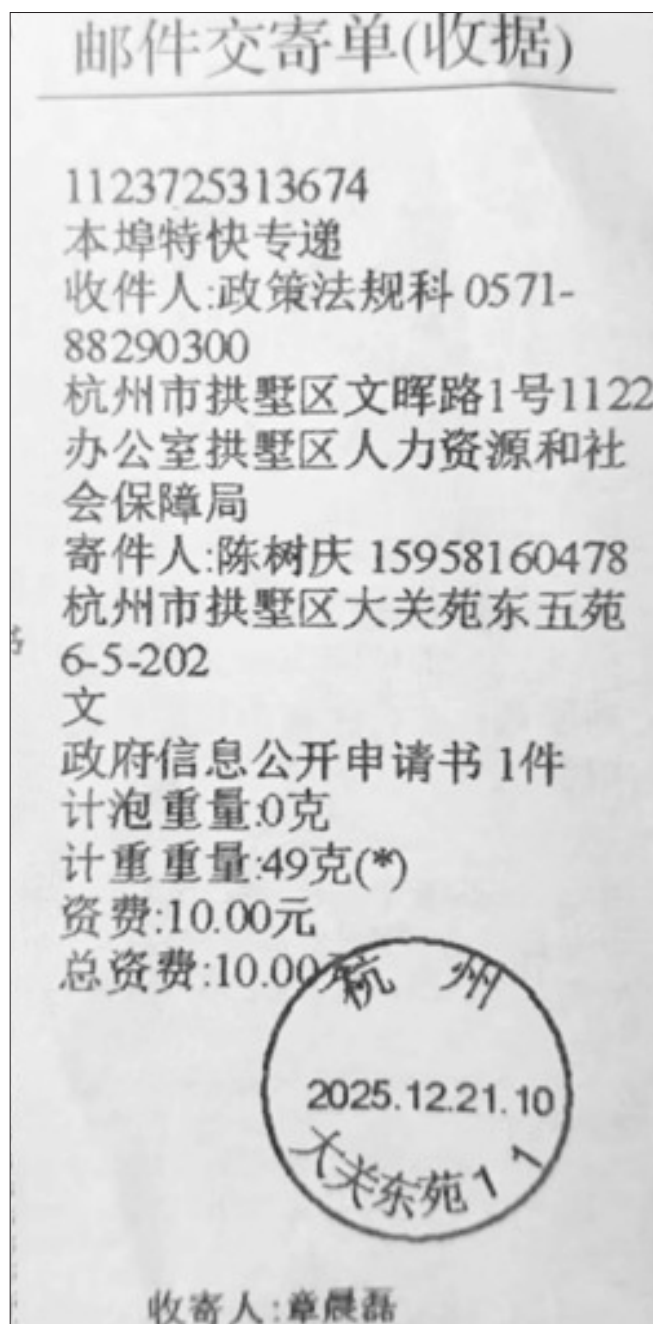
申请人：陈树庆

申请日期：2025年12月21日

附件1：申请人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包含正反两面)

附件2：拱墅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注：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已于2025年12月21日寄发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government credibility through the personal case of Chen Shuqing in Hangzhou. It argues that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depends on a basic principle long recognized in political thought: promises must be honored. In modern legal terms, this principle is reflected in the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reliance interests. When citizens comply with laws and policies in good faith, the government has a corresponding duty to act consistently and predictably.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daily survival and dignity of ordinary people. It also serves as a practical test of whether a government can be trusted. Stable policy design, transparent administration, and faithful fulfillment of obligations strengthen public confidence. In contrast, arbitrary reinterpretation of rules, vague references to unspecified policies, or retroactive denial of previously accepted contributions severely undermin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The article details Chen Shuqing's experience when applying for retirement benefit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four years of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Local authorities refused to process his retirement, claiming that periods of imprisonment invalidated contributions already paid and accepted. As a result, h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contribution period was reduced below the statutory minimum. Chen points out that ov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neither he nor his family was ever informed that contributions during imprisonment were prohibited. Even after his release, the authorities continued to accept supplementary payments without objection.

In response, Chen submitted a form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quest. He demanded clear legal grounds for declaring paid contributions invalid and for requiring refunds as a precondition for further retirement review. He argues that a government cannot lawfully collect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 for years and later deny its obligations without explicit statutory authorization. Such behavior transforms law into an elastic instrument that restrains citizens while excusing state defaul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are inseparable. When authorities honor their commitments, lawful expectations are protected and social order is reinforced. When they do not, public trust collapses, and governance itself loses its moral and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铁链之下，是一个民族被锁住的良心

作者：Chang Kun
编辑：李聪玲 翻译：彭小梅

2022年1月，一段模糊却刺眼的视频在寒冬中流出。画面里，一名女子被铁链拴在破屋中，脖颈被金属勒住，神情麻木，衣衫单薄。她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甚至不像一个被当作“人”对待的存在。后来，人们称她为“铁链女”。

铁链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揭开的黑暗，而是一次失败的遮掩。她之所以被世界看到，不是因为制度的自省，而是因为一段无法彻底抹除的视频。正因如此，她才如此令人恐惧——不是对民众而言，而是对统治者而言。

铁链锁住的从来不只是她的身体。那条铁链连接着拐卖、强迫婚姻、强迫生育、基层权力的合谋、地方政府的失职乃至包庇，也连接着一个长期将“稳定”置于人权之上的体制。在一个真正尊重法治与人的尊严的社会里，这样的场景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在中共治下，它却能成为“常态”，只是多数时候不允许被看见。

更令人愤怒的，并非暴行本身——因为暴行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而是暴行被曝光之后，权力所表现出的冷漠与傲慢。多次前后矛盾的官方通报，刻意模糊事实的表述，对追问者的封禁与打压，对民间调查者的威胁与噤声，都在清楚地告诉世人：在这个体系里，真相比受害者更危险。

铁链女没有被第一时间解救，却第一时间成为“舆情风险”。她的痛苦不是优先事项，如何让事件“降温”“翻篇”“消失”才是。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公开透明的司法追责，而是对讨论的压制；不是制度反思，而是对记忆的清洗。

铁链女之所以成为一个符号，是因为她让太多中国人意识到：她并不是唯一。她可能只是无数被拐卖、被囚禁、被强迫生育、被剥夺人生选择权的女性中，唯一被镜头捕捉到的那一个。还有更多人，被铁链锁住，却连被命名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政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决定了它的道德底线。一个以“人民”为名，却允许女性像物品一样被买卖、被占有、被消耗的体制，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尊严的系统性否定。铁链女不是中共暴政的“意外”，而是它长期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

纪念铁链女，并不是为了重复悲伤，而是拒绝遗忘。遗忘，正是暴政最渴望的结局。只要人们还在提起她，只要她仍被记住，那条铁链就没有真正完成它的使命。



命。

铁链女应当被纪念，不是作为一个被驯服的受害者，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被彻底抹去的控诉。她的存在提醒我们：当权力不受约束，当真相被压制，当个体尊严可以被牺牲来换取所谓的“稳定”，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条铁链的另一端。

铁链终会生锈，谎言终会坍塌。
但前提是，人们不再沉默

Beneath the Iron Chain, a Nation's Conscience in Captivit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ase of the chained woman exposed in China in 2022 as a symbol of systemic abuse. A brief video revealed a woman deprived of freedom, dignity, and identity, highlighting human trafficking, forced marriage, and of official negligence. The greater crime, the author argues, was the state's reaction: censorship, shifting narratives, and repression of inquiry. The chained woman represents countless unseen victims. Remembering her resists enforced forgetting and reminds society that silence enables cruel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权力、政党与人民的三角关系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委内瑞拉的清晨，街头爆炸声尚未散去，民众的欢呼却已经填满了加拉加斯天空。有的在街角高呼“自由来了！”，有的放声哭泣，恍惚之间好像终于走出了永无止境的夜晚。这一切并非闹剧，而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长期摩擦的浓缩图景。委内瑞拉的政权并非一夜之间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崩溃。它像一杯苦到极致的咖啡，长期浸泡着国家的制度、政党的结构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是什么？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权力的统筹者。它可以是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也可以是压迫与剥夺的机器。

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像闪电劈开夜空，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拘押，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失控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权力来自土地和军队；在现代，权力来自党、来自对话语的控制权、来自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石油成为国家的血液，而政党机器则成为撑起国家机器的支架。政党不再是人民意志的载体，而是权力本身的代言。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大厦，那么政党往往是其中最坚硬的梁柱。当梁柱开始腐朽，大厦内部的缝隙便会迅速扩大。

政党是国家的根基之一，但它的存在应该寄托于人民的愿望。然而，当一个政党与人民的利益长期脱节，它便会变成一个自转的机器。

这种机器有时看起来无比强大。它掌握军队、传媒、教育、经济命脉，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同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政党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人民，它就沦为权力的自我复制者。

委内瑞拉曾经举办选举，但长期以来，反对声音被压制、选举结果受到质疑——当政党把选举当成橡皮图章时，它就已经把自己与人民分离。结果不是人民离开了政党，而是政党先离开了人民。

在这种分离之后，无论政党如何高谈国家尊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怒斥他国干涉，它都像孤岛上的独裁者，四周是水，内部是干涸的希望。

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很多



人松了一口气，甚至爆发出近乎庆祝般的反应——这并非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对长期绝望的一种释放。人们欢呼的不是他国力量介入，而是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在历史时刻的突然松绑。

历史的深处，人民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一瞬，而在于日常的累积：从被孤立的声音、被禁止的集会、被封锁的言论，到街头那一句无意识的叹息。

当一个国家的政党形同独裁机器而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时，人们其实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语之中。权力的顶层高级官僚可以互相对峙、可以在议会辩论，可以对外强硬，但底层民众的意愿在权力结构中则往往是不可见的。民众的“庆祝”不是简单的喜剧式快感，而是对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解脱。

外力出现时，人们本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欢迎它，因为它看起来终结了长期的压迫；另一类反对它，因为外力介入意味着国家主权受损。

这两种情绪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外力介入往往是矛盾的叠加体：它既可能终结一个腐朽的权力体系，也可能把新的外部意志强加给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人民高呼自由的同时，理性的一部分会问：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当外界调侃“美国来就是为了石油”，这其实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冷嘲。权力总是带着利益而来，而国家、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在这利益与权力之间展开无声的战争。但是对于人民，谁来当政都是一样的，眼前的生活更为重要。顶层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是遥不可及又息息相关的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天赋人权。

历史上真正的强权，并非来自军队或财力，而是取决于其能否代表人民。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自我，就终将被人民抛弃；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代表一己之私，那他被历史审判也是必然。

马杜罗事件是一出国际政治大戏中的一幕，它暴露了现代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脆弱平衡，也提醒我们思考：国家为何而存在？政党与人民的契约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意志如何被听见与尊重？

权力不是象牙塔的奢侈品，而是对社会整体意志的集体回应。

失去了人民的权力，最终只是虚影一场。历史并不会因高墙和戒严而停滞，它只是在等待那个真正能够解读人民声音的人或力量出现。

权力、政党、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平衡。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独裁者被捕而结束，它不会因为外力介入而完成正义。

真正的黎明，不是庆祝的烟火，而是人民终于能够自主选择自身命运的那一天。

这件事让我想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一句话：“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很多中国人听此就会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卖国”“自恨”“给帝国主义递刀子”。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往往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是他们自己被灌输出来的“国家崇拜症”。

刘晓波并不是在请求外国军舰开进黄浦江，也不是在为殖民历史洗白。他在说一件更残酷的事：当一个社会内部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唯一可能改变它的，只能是外力。

这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悲观主义。

委内瑞拉的问题正是如此，并不是“马杜罗坏”，而是：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内部政治机制更换坏人的能力。

选举被操控，媒体被压制，军队被党化，司法沦为橡皮图章。于是政权不再靠合法性生存，而靠恐惧。

中国的结构，本质上与之相同，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技术化。在这种体制里，人民不是公民，而是“人口”；政党不是工具，而是“命运”；国家不是公共空间，而是“权力容器”。

你可以骂，你可以忍，你可以逃，但你无法改变。

刘晓波那句“殖民三百年”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体系内部，已经没有产生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土壤。

当人民被锁在体制里，外力就变成“撬棍”。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神话：“只要我们慢慢发展，专制会自然消失。”

但现实是：专制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强大、更精准、更难推翻。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也是。

当内部反对派被清洗干净，社会组织被摧毁，信息

被垄断，人民就变成了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政治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打断权力的自我复制链条。

这正是为什么马杜罗被抓时，委内瑞拉人不是抗议“主权被侵犯”，而是在街头跳舞。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国家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其实“主权”在独裁国家，最终也只是统治者的盾牌。专制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内政。”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通过选票、媒体、法院、集会来表达意志时，这个“我们”还存在吗？

所谓“国家主权”，在独裁体制下，往往只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占有权。

所以当中国的宣传机器高喊“反对外国干涉”时，翻译过来其实是：“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统治的力量。”

刘晓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被当成“叛国”的话。

殖民不是目的，破坏专制才是。

刘晓波不是要中国变成殖民地，就像今天委内瑞拉人不是要美国统治他们。

他们要的是一件更简单的东西：让这个不能被更换的权力，被迫松手。

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下台靠选票；在一个极权国家，政府下台只能靠崩溃。

而崩溃，往往需要外力。

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被绑着、被堵着嘴、被没收钥匙，这时有人从外面把门踹开，你能说他“侵犯住宅权”吗？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外国太坏”，而是：我们的门，早就被里面的人反锁了。

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不是对外国的跪拜，而是对本国权力结构绝望到极点后的冷静结论。

它的真正含义只有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解放的能力，任何外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起爆器。

愿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不再是牢笼，而是舞台；愿每一个政党都不是权力的牢主，而是人民意志的代言；愿每一个人民，都不再被噤声，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拥有自己真实的名字。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反对派被清除，制度便不再需要解释

——写在香港民主党解散之后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2025年12月14日，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中，反对派的存在，从来不是威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证明——权力仍然承认自身有限，证明制度仍然相信辩论，证明统治仍然愿意被质询、被监督、被纠错。而当一个政权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它真正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它已经不再需要被解释。

香港民主党的角色，从来不是推翻秩序。它所做的，只是提醒秩序仍需回应人民。

12月14日，这个成立逾三十年、曾是香港立法会最大反对党的政党，走到了终点。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高层曾被中国官员或中间人接触，被明确告知：若不解散，将面临被捕等严重后果。这不是一次政治竞争的失败，而是一次制度性“清场”的完成。

民主党成立于1994年，诞生于香港仍被视为一个“可以讨论未来”的地方。它长期作为反对派领头羊，主张民主改革，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这些在过去曾被写入香港政治语言的词汇，如今却变得危险。

2020年，民主党公开反对《国安法》。同年，自行规划初选。结果并非选举失败，而是政治后果：时任党主席胡志伟被捕，反对派整体被视为“风险源”。

2021年，北京彻底重塑香港选举制度，只允许经审查的“爱国者”参选。反对派从议会被逐步清除，不是因为输了选票，而是因为失去了被允许存在的资格。政治不再是竞争，而变成筛选。最终的结局，并不突然。

2025年2月，民主党宣布启动解散程序；4月，授权中委会处理解散与清盘。而12月14日，只是制度逻辑的最后一步。一个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体制，并不是更稳定，而是更脆弱。

因为反对派真正的功能，从来不是夺权，而是让权力记住：它仍然需要解释自己。

当反对派被清除，权力不再需要回答“为什么”；当议会只剩一种声音，错误也失去了被纠正的路径；当制度不再容许不同意见，社会便只剩下顺从与沉默。

而沉默，并不等于认同。香港民主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它曾经代表的价值消失了。它只意味着，这些价值已经无法在公开政治中被表达。在一个仍然自信的制度里，反对派是被容忍的；在一个失去安全感的体制里，反对派是必须被消灭的。

历史会记住的，并不只是一个政党的终结，而是



一个城市何时、如何，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当反对派不再存在，问题从来不是“谁赢了”，而是：这个制度，已经不打算再回答任何人。

When the Opposition Is Eliminated, the System No Longer Needs to Explain Itself

On December 14, 2025, Hong Kong's Democratic Party announced its dissolution. This was not the result of losing elections, but the completion of a systematic political purge. In any normal political system, the opposition is not a danger. It is evidence that power accepts limits, debate, and accountability. When a regime no longer permits opposition to exist, it is declaring that it no longer needs to justify itself.

Founded in 1994, the Democratic Party long served as the leading opposition force in Hong Kong. Its role was not to overthrow the system, but to demand that authority answer to the public. That role became unacceptable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2020. Party leaders were arrested, dissent was labeled a security risk, and elections were redesigned to exclude anyone not deemed politically loyal. Opposition was not defeated at the ballot box; it was denied the right to exist.

Reports indicate party leaders were warned that refusal to dissolve would lead to arrest. Under such pressure, dissolution was coercion, not choice. Eliminating opposition does not strengthen a system. It reveals fear. When dissent is erased, silence replaces consent, and power no longer answers questions, it only demands obedi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澎湖海战》的笑剧：粉红和中共官方的伪争论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最近中共拍了一部电影，名叫《澎湖海战》，讲的是清朝康熙帝和将领施琅攻灭台湾郑氏政权的历史。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部为习近平武统台湾舆论造势的宣传片。不过，这部片子却引发了巨大的舆论翻车，甚至不少粉红都因此大感不爽。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清朝崛起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段北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中共和粉红天天拿“汉奸”的棒子打别人，结果拍了一部政宣片，却把“真汉奸”施琅当成“统一祖国”的正面人物，把“17世纪汉人的最后正统”郑氏政权当成反面人物。因此，事情就变得滑稽了起来：闹了半天，原来共产党自己才是大清和“真汉奸”的继承人——结合中共把马列奉为祖师爷来看，就更有喜剧效果了。

不过，一些信奉皇汉思想的粉红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又颇有一种割裂感：他们一边反对清朝武统台湾，一边又支持中共武统台湾。在他们看来，郑家、中共都是“好人”，清朝、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坏人”，因为郑家和中共都是“华夏正统”，清朝和中华民国台湾分别是“蛮夷”和“西方势力代言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粉红的这套认知，其实依然滑稽透顶。因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无论怎么看，都更为相似：两者都在台湾，两者分别比清朝和中共更自由（郑氏政权的海洋贸易自由程度，是大搞沿海迁界、制造大量民众死亡的清初比不了的）。而中共和清朝，无论是控制范围，还是自由程度，也都更为相似（当然，就算在清朝专制程度顶峰的雍乾时期，民众的结社自由其实也是比中共时代多的）。

笔者还是有基本的常识，能看出来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更像，中共和清朝更像，能看出无论是中共官方还是粉红，在《澎湖海战》这件事上各自的滑稽之处：

粉红认为明郑和中共更像，清朝和中华民国台湾更像，并支持明郑和中共，这当然很可笑。

中共官方认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更像，清朝和中共更像，并认为清朝和中共是所谓“正面”的一方，这当然也很滑稽。

实际上，用简单的常识就能看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更像，中共和清朝更像，而清朝和中共当然是反面的一方。

因此，面对粉红vs中共官方在《澎湖海战》事件上

的争论，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两者的观点都是伪概念，两者的争论都是一种伪争论，两者本质上大同小异，其实都是支持习近平武统台湾的，两者的观点都是可笑的。

这里还需要讲一点题外话：笔者不是“明粉”或“清粉”，也不是任何古代朝代的“粉丝”。笔者更是一直认为无论明朝还是清朝，还是秦汉晋隋唐宋元之类的朝代，本质上都没多大区别，都是僭主皇权朝代；至于这些朝代的制度不同，大体上也就是换着不同的花样虐待“草民”罢了——其中有的朝代有的时候大概虐待得轻点，那也依然是虐待。要说笔者真的喜欢什么时代，那一个是西周春秋，另一个是清末民国。至于笔者为什么喜欢，这个需要专文另说了。

The Farce of The Battle of Penghu: A Pseudo Debate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the CCP

The CCP film The Battle of Penghu is a political propaganda project aimed at legitimizing a future military takeover of Taiwan. By portraying the Qing dynasty conquest of the Zheng regime as heroic unification, the film exposes deep historical contradictions. The Qing was a Manchu conquest regime, yet the movie glorifies Shi Lang, often viewed as a collaborator, while vilifying the Zheng regime, commonly seen as the last Han polit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is irony triggered backlash even among nationalist supporters.

Some nationalists attempt to justify this by redefining legitimacy, supporting both the Zheng regime and the CCP while rejecting the Qing and modern Taiwan. This logic collapses under basic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e Zheng regime and modern Taiwan share greater similarities in autonomy and relative freedom, while the Qing state and the CCP resemble each other in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repression.

Ultimately, the dispute between official 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t outrage is a false debate. Both sides share the same core goal: justifying authoritarian unif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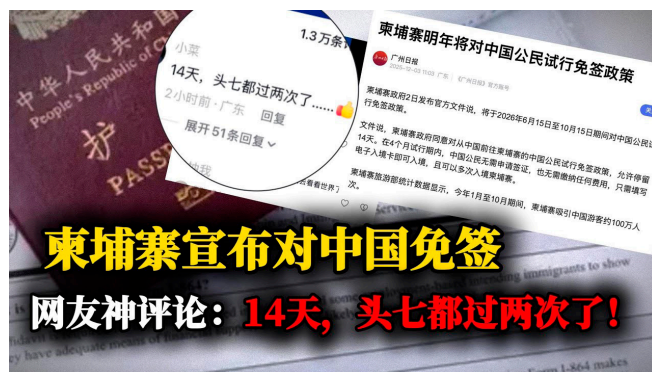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危险国家是天堂，安全国家是地狱

——中共的旅行逻辑

作者：毛一炜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最近看到中国忽然刮起一阵奇怪的风——俄罗斯免签刚落地，各种宣传就像接到命令一样，满屏在喊“快去！特别安全！”柬埔寨那边也是同样的夸法，一个是现实里电诈、绑架频发的国家，一个是前线每天还有炮火，战争都还没结束的国家，能被吹成地球上最值得旅游的地方。要是不知道的人，真的会以为那里是度假胜地。

可偏偏，日本、韩国、欧美这些治安好、制度成熟、游客体验稳定的地方，却被描绘得像洪水猛兽一样。“不安全”、“排华”、“千万别去”——这种话每隔几个月就在国内循环播放。即使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在他们嘴里也是险象环生。

一个常识是，正常国家不会鼓励自己的公民去战区旅行，也不会让人往治安混乱、制度薄弱的地方扎堆。可现实是，中共不仅不提醒，反而拼命催你去。

这不是因为那里安全，而是因为——它放心那些地方不会让你“看清世界”。

你真要去了日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你看到的新闻自由、社会秩序、法治结构，都足以把它几十年的宣传撕开一个口子。而去俄罗斯、去柬埔寨，你看到的混乱和腐败，反而让你更不会质疑“中国模式”。宣传不是为了你的体验，而是为了它的政治需要。

最讽刺的是，我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已经反复刷到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被黑警勒索的经历：以“没有居住证”为名罚款。免签国家的游客怎么可能有“居住证”？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全世界都知道俄警腐败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国内宣传从来不提一句，因为那会影响他们塑造的“友好兄弟形象”。

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反差——中共拼命吹的地方，处处是坑；中共极力阻止你去的，反而最安全。

而这种反差在国内早就埋下了伏笔。公务员、老师、银行系统、国企员工，一大片群体的护照被集中收走，不能自由出国。理由永远是那几句机械的“涉密”、“统一管理”，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不是怕泄密，而是怕他们看见自由世界的模样。

所以它必须不断夸大危险、制造恐惧、扭曲现实，让你对真正正常的国家望而却步；同时又极力吹捧那些它能掌控叙事的国家，好让你以为自己“出去看世界”了，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信息笼子里打转。

它口中的“危险”，往往只是自由；

它口中的“安全”，往往才是真正的风险。

世界并不是中共描述的那样，但中共最怕的，就是你亲自去看看真正的世界。

Dangerous Countries as Paradise, Safe Countries as Hell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vel narrative that praises risky destinations while warning against safe and open societies. As visa free travel to Russia and Cambodia is promoted as safe and attractive, countries with war, corruption, or rampant crime are marketed as ideal tourist choices. At the same time, Japan, South Kore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ortrayed as dangerous and hostile, despite their low crime rates and stable institutions. The logic is political rather than practical. Visiting free societies exposes travelers to rule of law, open media, and social trust, undermining decades of propaganda. By contrast, visiting authoritarian or chaotic states reinforces the claim that disorder is normal everywhere. The essay also highlights passport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many Chinese professionals, revealing a deeper fear of citizens seeing the free world first hand. In this inverted narrative, freedom is labeled danger, while real risk is sold as safe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威权黄昏的到来

作者：卢超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最近这一阵子，国际新闻看下来，真有点“独裁者排队倒下”的感觉。

德黑兰枪声：不再恐惧的伊朗人

就在今年1月，伊朗的局势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这场从去年底爆发的抗议，起因还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崩溃——通胀率飙升，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买不起。但这一次，火苗迅速蔓延成大火。

细节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惨烈。据报道，德黑兰的抗议已经蔓延到180多个城市。虽然伊朗当局故技重施，在1月8日实施了全国断网，并出动安全部队开枪镇压，但是这次年轻人没退缩。最震撼的消息是，有视频流出显示德黑兰郊区的停尸房里堆满了遇难者的遗体，民间传闻遇难人数甚至超过了万人。

这次抗议有一个细节很关键：口号变了。以前大家可能还只是喊喊“要面包”，现在满大街喊的是“打倒哈梅内伊”。更重要的是，像阿卜达南这样的城市，安全部队竟然因为无法维持局面而选择了撤离。当暴力工具开始失效，当恐惧不再能吓住老百姓，这个神权独裁政权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

纽约囚服：马杜罗的神话破灭

如果说伊朗还在“挣扎”，那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则是彻底“凉了”。2026年1月3日，美军发动了名为“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在加拉加斯直接抓捕了马杜罗及其夫人，并迅速把他们押解到了纽约。

这个细节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在电视上指点江山、大谈反美的独裁者，几天后竟然身穿囚服、戴着手铐出现在纽约的法庭上。马杜罗一直觉得只要抓牢军方、搞定选举，就能靠石油财富一直统治下去。但他忽略了，当国家通胀到钞票不如废纸、数百万人流亡海外时，他的统治根基早已腐烂。

马杜罗的倒台给全世界的独裁者提了个醒：在这个时代，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即便你自诩有强大的武装，但在失去民心和社会合法性之后，崩溃往往就在一夜之间。

全球趋势重点：独裁者的生存空间在缩小

这两个事件连在一起看，其实释放了一个信号：独裁统治的“红利期”结束了。

过去独裁政权靠三招：封锁消息、经济收买、武

力镇压。但现在，虽然有高科技监控，但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依然挡不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独裁者没钱收买人心了；而当镇压的代价大到连士兵都不愿开枪时，独裁政权的死穴就被点中了。

展望国内：中国高压效应已经形成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虽然现在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各方面的控制手段也比伊朗、委内瑞拉高明得多，但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过去大家愿意听话，是因为日子还能过，有一种“拿自由换面包”的默契。但现在经济慢下来了，年轻人找工作难，这种默契就开始裂了。再加上那种无孔不入的监控，短期看确实有效，但长期看，它就像个高压锅，把所有的不满都闷在里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看未来的中国民主，我觉得没必要认为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它更多的是一种“憋不住”的过程。当大家发现原本那套法子不灵了，当每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不能永远被代表时，改变就会发生了。

历史这东西，一旦开了倒车，最后总会撞到墙。那些看起来铁板一块的墙，其实裂缝早就在里面长出来了。总结来看：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不会是委内瑞拉那种戏剧性的“外力突袭”，而更像是一种“冰川崩裂”的过程——起初是看不见的裂纹，接着是咔咔作响的断裂，最后是不可阻挡的崩塌。



The Coming of Authoritarian Twilight

Recent events suggest shrinking space for dictators. In Iran, protests persist as fear fades amid economic collapse. Venezuela illustrates how hollowed legitimacy can end abruptly. The pattern is structural: information spreads, resources dry up, and repression loses effect. China appears stable, yet mounting pressure and slowdown point to gradual internal fracture rather than sudden collap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政权发动重大政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社会代价

作者：Lewis Lin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引言：历史书写与责任问题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都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解释能力。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现实政治进步的基础。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发动并主导了一系列深刻改变中国百姓命运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在中共的叙事中往往被描述为“必要的历史阶段”或“探索中的曲折”。然而，随着档案逐步解密、幸存者回忆、出版、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积累，诸多问题无法回避：这些政治运动造成了何种规模的社会伤灾难？责任与机制又是如何运作？

本文将以前史研究与公开资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中共执政以来若干关键政治运动的背景、实施方式与社会代价，并讨论其制度性成因。

一、土地改革与“镇反”：革命暴力的制度化起点

1949年后，中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其目标是摧毁传统乡村精英结构，重构契合中共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根据官方文件与后来的研究，土地改革的目的并非是经济政策，更重要的是广泛的阶级划分与暴力清算。

1950—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是中共建政初期最重要的政治清洗之一。根据中共内部后来披露的数据，被处决人数在数十万到上百万之间。学者如杨继绳、丁抒等通过地方档案推算，认为这一数字可能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镇反并非失控的暴力，而是高度制度化的政治行动：中共政权明确下达“杀人指标”，要求公开处决以震慑社会，司法程序高度简化甚至取消，这奠定了一种政治逻辑：中共政权可以在“政治需要”之下，

合法化大规模剥夺人民生命的行为。

二、大跃进与饥荒：政策失误还是结构性灾难？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被官方长期解释为“急于求成的错误”。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步形成共识：1959—1961年间发生的饥荒，是20世纪全球最严重的由中共党人人为制造的饥荒之一。

关于死亡人数，研究估计为1500万人至4000万人不等。即便取最低值，也已构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关键问题不在于数字争议，而在于中共政权的制度机制；虚报产量：中共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的政治压力导致粮食产量被严重夸大；强制征购：中共政权在已知粮食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高额强征农民的粮食；信息封锁：实情被系统性压制，各级政府默许甚至参与欺瞒虚报；责任豁免：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皆不承担直接后果。多项研究指出，这场饥荒并非自然灾害，而是由中共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欺瞒虚报至决策情报失真所引发。

三、文化大革命：权力斗争与社会崩解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破坏性最强、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官方定性为“十年内乱”，但对其深层机制的讨论始终限制。

文革的显著特征包括：以意识形态忠诚取代法治与专业标准；鼓励民众对民众间相互仇恨争斗的政治暴力；系统性羞辱、迫害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国家机器在相当时期内被中共政权夺去基本治理功能。研究者指出，文革不但是单纯的“个人错误”，而是在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中，最高领袖意志被无限放大的结果。死亡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但学界普遍认为至少数百万非正常死亡，更多人和家庭遭受终身创伤。

四、1989年政治风波：改革限度的边界

1989年的学生运动与随后发生的武力镇压，是改革开放后最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之一。尽管官方至今对相关史料严密控制，但国内外研究已基本还原事件脉络。

这场由北京知名大学生发起的8964运动，关键意义在于：表明中共的政治改革有不可逾越的红线；军队被用于对付国内民众与中共政权之间的政治冲突；形成一段长期的历史禁区与记忆断裂。

此后，中共在经济领域继续改革，但在政治领域确立了高度警惕与严厉控制的中共党国路线。

五、有限反思与制度性遗忘

改革开放后，中共对部分历史问题虽有进行过有限反思，如：

为冤假错案平反，否定文革，调整经济路线等；但这些反思具有明显边界，不追究最高决策层的制度责任，不允许民间独立研究，不形成可问责的政治机制，其结果是，历史被“技术性纠错”，却不能及造成重大灾难的权力责任人和中共党国政权体制本身。罪恶没有被追究、体制没有被纠正。

六、制度视角下的总结

从历史角度看，上述政治运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呈现出一致的结构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独立司法与监督，信息垄断，中共的意识形态凌驾于民众的生命之上。这使得整个社会的个人悲剧能够不断被制度性复制，而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坏人”。

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目的不应该限于制造仇恨，而更应该在于理解政权的机制。只有当社会能够正视制度性错误，承认生命不可替代的价值，历史才可能真正成为未来的警示，而不是灾难循环的节奏。然中共对他们执政过程中人为造成的诸多如此在重大历史灾难问题上的回避、粉饰、掩盖，必让这个政权下的历史悲剧和灾难不断重演！



A Historical Review of Major Political Campaigns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ir Social Costs

Since 194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initiated a series of large scale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fundamentally reshaped Chinese society. Official accounts often describe these movements as necessary historical stages or correctable policy errors. However, research based on archives, survivor testimony,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indicates that these campaigns produced massive and largely avoidable human losses rooted in systemic political structures rather than temporary mistakes.

Land reform and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mark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violence. These actions were centrally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execution quotas, public punishment, and the suspension of judicial safeguards. Violence was not accidental but embedded in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a precedent in which mass killing could be legitimized by political necessit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famine of 1959 to 1961 represent one of the deadliest man made disas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ath toll estimates range from fifteen to forty million. The catastrophe resulted from structural mechanisms including falsified production reports driven by political pressure, compulsory grain requisition despite shortages, systematic information suppression, and the absence of accountability for decision mak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consequences of unchecked power. From 1966 to 1976, legal institutions collapsed, ideological loyalty replace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mass persecution became normalized. Millions suffered imprisonment, humiliation, or death, reflecting systemic failures rather than isolated leadership errors.

The 1989 political crisis revealed the strict limits of reform under one party rule, as popular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were met with military force. Subsequent official reflections avoided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focusing instead on limited technical corrections.

Across these campaigns, consistent features emerge: concentrated authority, lack of independent oversight, monopoly over information, and the prioritization of ideology over human life. Without confronting these structural causes, historical tragedies remain vulnerable to repeti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归途之上

——致黎智英先生

作者：赵令军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在全球持续关注中，黎智英案终于进入关键审理阶段：

黎智英老先生被判“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3项罪名，至此，已被关押了5年多，前后被审讯了共156天的黎先生，总算被中共强按了几个正式的罪名。黎先生坚持自己无罪，但《国安法》指定的3名法官，判定他有罪。

虽然最终量刑结果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仅“勾结外国势力、煽动颠覆”这一项指控，便足以判处无期徒刑。黎先生已年近八旬，长期监禁对其身体的摧残早已显现；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下，人们几乎看不到他重获自由的可能。

而黎老先生，显然已经做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准备！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选择！

在当代政治迫害史中，有一种选择反复出现，却始终令人心惊：

明知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仍然选择坚守或回归。

黎智英先生，正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作为香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传媒人之一，他并非无路可退。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巨额财富，并持有英国护照，离开香港，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继续在海外发声，也完全可行。但在香港自由迅速坠落的关键时刻，他婉拒了好友的劝说，依然选择留下，并最终被捕入狱。

在被关押前夕，他于九龙家中接受 BBC 记者采访。当记者试图询问——或者说，提醒他，是留在香港还是

迁往他处生活时，他不等问题说完，便平静地回答：在狱中。

他说：

现在在这里，我是平静地活着；在狱中，我是有意义地活着。

那不是一句即兴的话，那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清楚认知。

“有意义的活着”，不是激情的宣言，而是一条清醒而孤独的归途。

这条路，通往牢狱，通往审判，也通往历史。

选择，并非源于误判，也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清醒而沉重的判断。

一、为什么不走？

在威权体制下，“离开”往往被视为理性之举。

安全、自由、持续发声——这些理由看似无可反驳。

但问题在于：

当所有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什么？

留下来的，不仅是风险，更是被迫承担“失败者”“被抛弃者”的身份。

而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清空。

黎智英拒绝让这种逻辑成立，他说：我不能离开。一旦离开，即会影响苹果日报的信誉，也会影响民主运动的团结。这件事，必须由我来承担责任！

他的留下，意味着一种立场：

不是因为走不了，而是拒绝让“离开”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当身体成为证据

在极权环境中，语言最容易被扭曲和掏空。

“法治”、“秩序”、“稳定”、“国家安全”这些词汇被反复使用，却不断被重新定义，最终服务于独裁专制本身。

当语言失去可信度，人的遭遇，就成了最后的证据。

黎智英的被捕，清楚地表明：

所谓“依法治港”，并非法律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权力对法律的占用。

他的审判，也以最直观的方式证明：

那个曾以法治与自由著称的百年香港，在被中共统治仅二十余年后，迅速陨落——经济凋敝、法治崩塌、自由消亡，使得中共对于香港自由、繁荣状况的一切辩解，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愈发苍白。

三、相似的归宿：纳瓦尔尼先生与金明日牧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却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并成功治疗后，本来可以选择在德国陪伴家人并用另一种方式抗争的，但依然返回俄罗斯。他十分清楚，等待他的将是监禁，甚至更糟的结局。但他仍然选择回去。

因为他明白：如果反对只能在流亡中存在，那么权力就已经赢得了道德优势。

他的死亡，彻底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金明日牧师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他原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做牧师，家人也在身边陪伴，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依然选择了宗教自由被严格控制、甚至被摧毁的中国，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继续牧养、讲道、见证。

金牧师的选择并非出于政治动员，而是源自信仰本身；被捕后，面对来访者，他说：以前看到其他的牧师或传道人被捕，他无能为力，很是纠结；现在自己被抓，反而觉得很坦然了。

以生命实践信仰，以大无畏的牺牲，深刻诠释“为

真理而死”境界。

他们都明白：

真理若只能在安全之地被宣讲，便失去了超越性。

四、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现实结果看，他们的选择并未带来立刻的改变：

香港未能因此恢复自由！

俄罗斯未能因此走向民主！

中国的宗教与言论空间依然严重受限！

如果仅以短期成效衡量，这些牺牲似乎“并不值得”。

历史也从来不只由结果构成。

但他们发出的光芒，会引领很多人走出黑暗！

五、不可被抹去的意义

威权最渴望塑造的，是一种顺从的共识：

低头是理性，沉默是成熟，活着比尊严重要。

而黎智英、纳瓦尔尼、金明日牧师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在道德上彻底破产。

他们并未诉诸暴力，也未谋取私利，

他们只是拒绝配合谎言，坚持真理。

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被彻底抹黑，也无法被轻易遗忘。

结语：归途之上的人

他们并不要求后来者复制他们的道路，因为牺牲从来不是义务。

但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后来的人，才仍然拥有选择是否站立自由。

归途之上，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也有人回去。

黎智英等伟大的殉道者们，选择了回归和坚守。

而这种选择本身，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沉重的注脚。



赵令军 (Frank) 202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 加拿大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冻馁的幼童与权力垄断的恐惧

——为何中共视民间慈善为眼中钉？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凛冽的寒风中，偏远地区的孩子穿着破烂单衣，脚上还是夏天的凉鞋，小手被冻得一道道开裂。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见过的刺痛人心的画面。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长期缺乏照料与御寒条件的留守儿童死于破旧屋中，这一事件曾短暂震动全国，却很快被舆论封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都会激发起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援助。然而，在中国，伸向这些孩子的温暖的手，却总是被名为“政治安全”的冰冷手铐锁住。

人们难道不奇怪吗？一个拥有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维稳机器的政权，怎么偏偏怕几件棉衣、几箱牛奶和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好心人？2018年，多名志愿者在甘肃、青海等地为牧区儿童募集御寒物资时，被以“未经批准开展活动”为由约谈，部分物资被扣留，相关人员被警告不得再组织类似捐助。

现在，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开核心。

首先是，救助者有罪：人们的善良超过了权力的边界。

在极权逻辑下，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听起来可能荒谬，但是有许多例子。比如，立人图书馆。曾经试图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开启民智的民间组织“立人”，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数十所乡村图书室，却因被认定存在“意识形态风险”，负责人被长期约谈，项目被全面叫停，图书被封存，志愿者网络被强行解散。政府害怕的不是那些书，而是怕孩子们在棉衣之外，还获得了思考的能力。

比如，天使妈妈。多年来，无数非官方的孤独院被强制取缔。一些跨省救助病童、弃婴的志愿者，曾被以“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为由调查，救助通道被迫中断。官方宁愿让孩子在福利院的破窗里无助地消瘦，也不允许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团体展现出超越体制的温情。自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以来，无数深耕基层、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劳工、性别、教育类NGO被扣上了“境外渗透”的帽子，被连根拔起。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大量民间公益项目被迫注销，负责人被限制出境或长期监控。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在中共当局眼中，一个不受控的救助者，比一个受冻的孩子要危险得多。

其次是独裁者的逻辑：宁愿“绝对控制”，也不要“社

会自己救自己”。中国对民间慈善的排斥，源自其骨髓深处的三个深度恐惧。

一是恐惧“组织化”的萌芽。独裁政权最害怕的是民众产生横向的联系。慈善活动天然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能让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部分不隶属于官方体系的民间救援队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被禁止进入灾区，而救援迟滞的现场画面却被迅速清理。对于一个推崇“原子化社会”的政权来说，任何能绕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纽带，都是对其统治权力的直接威胁。

然后是恐惧“合法化”的流失。中共始终强调，共产党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民间组织在灾难和贫困面前表现得比政府更迅速、更透明、更具人文关怀，那民众就会发问：“既然民间能做得更好，我要这个臃肿贪腐的官僚系统何用？”在多次灾害中，民间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公布救援与物资信息，反而被要求删除内容，而官方通报却往往迟至数日之后才出现。为了掩盖无能，它必须扼杀卓越。

第三个恐惧，也是最虚伪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惧真相。每一个需要民间求助的孩子，都是对“大国崛起”和“全面脱贫”谎言的无声控诉。民间慈善的介入，必然伴随着实地调查和信息传播，这会刺破官媒编织的盛世幻境。类似的逻辑在新冠疫情初期已被反复验证：民间记录与求助信息被迅速删除，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他们于是出手了——既要捂住受灾者的嘴，又要斩断救助者的手。

洋葱被剥开以后，就可以站上高墙，低头俯瞰这权力下的寒冬如何凛冽。慈善被收编为“官僚红十字会”式的权力寻租场。当爱心必须经过层层政审才能到达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不仅是在拒绝外界的帮助，更是在扼杀整个国民的道德活力与同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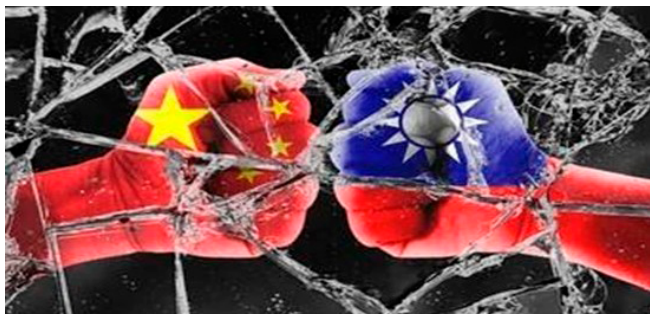
冰天雪地里，孩子依然在瑟瑟发抖，而那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正躲在高墙背后，警惕地盯着每一件试图递过墙去的棉衣与书。这种对温情的恐惧，恰恰是共产党内心极度虚弱与恐惧的明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台湾：在大国阴影下的清醒时刻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我在中国大陆长大，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压抑。那种压抑并不是某一天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是一种从空气里长出来的东西——它渗进语言，渗进习惯，最后渗进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我比很多人更早明白，尊重一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比爱国口号重要得多。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加州的一场学术论坛上，听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感叹：“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

那一刻，现场陷入短暂的沉默。没有人反驳，因为这句话折射出的，不仅是台湾的焦虑，也揭示出整个东亚的脆弱现实。

会后，我和一些台湾朋友聊天。他们大多不是政治人物，只是普通百姓。多数人说，他们希望维持现状，希望和平。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更害怕失去安稳的日常。和平在他们嘴里，不是政治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在政治的“统”“独”之间更像是群众的心声。

台湾社会这些年，总像活在一个假设之下：若中国入侵，国际社会必然出手相助。这个假设在冷战时期或许合理，但在今日的国际格局中，已显得越来越脆弱。单从现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来看，已经不是单纯由道义驱动，而更深植于利益权衡。台湾对此并非毫无察觉。1978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那一刻，这个教训便深深烙印在台湾的集体记忆中。当卡特宣布与北京建交，蒋经国在深夜被告知这一决定时的沉默，象征着台湾被现实政治抛弃的那一瞬间。

此后，台湾在中美之间艰难维持模糊的安全感——既倚赖美国的军售与承诺，又谨慎避免触怒北京。但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再度浮现，台湾开始意识到：它或许只是棋盘上的一枚筹码，而非真正被视为命运共同体的盟友。

前不久，川普与习近平会面，台湾议题未被公开提

及。事后，美方仅轻描淡写地表示：“习近平不会动台湾，他知道后果。”这句模糊的话语令人想起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外界期待的援助最终化为一句“那是中国的事”。所谓“后果”，从未明确指向善恶，只是政治表演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渐退的时代，介入与袖手之间，从来不是道德，而是经过计算的。

美国对亚洲的态度，从来笼罩着复杂的历史阴影。十九世纪末，随着大量华工抵达西岸，“黄祸”（Yellow Peril）成为舆论的高频词汇。那种恐惧不仅源于种族主义，也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视角至今仍以更精致的形式存在：在国际的政治语言中，亚洲国家要么被视为“值得扶持的民主伙伴”，要么被标记为“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台湾正处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摇摆。当它符合战略利益时，是“民主灯塔”；当它可能牵动冲突时，又被视作“地缘风险”。这种被动处境，其实延续着百年前的“黄祸”逻辑——只是换上了更文明的外衣。在西方视角下，亚洲国家的价值，往往不是由其人民决定，而是由它们在大国竞争格局中的位置决定。

台湾社会的撕裂，表面上是蓝绿对立，深层则是恐惧的扩散。人们害怕被中国吞并，也害怕被国际社会放弃。于是，任何有关“对话”与“和解”的讨论，都会被迅速贴上“亲共”或“投降”的标签。这种语境让我想起自己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年代——一个言论受限、政治紧绷的时代。我从小被教育要“警惕敌对势力”“坚决反对分裂”，那种基于恐惧的国家认同让我曾以为安全，其实只是思想的牢笼。如今，当我在美国听到台湾内部以同样的语言描述“对岸”，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自由社会最珍贵的地方，不在于仇恨的正确性，而在于理性的可能性。

和解与投降之间有清晰界线。和平，不是屈服，而是掌握谈判主动权的智慧。若要守护民主制度，台湾必须首先避免被卷入大国的战争。马英九执政时期（2008–2016）曾短暂证明这一点——两岸关系在那段时间出现了罕见的缓和：学术交流、商业往来、文化互访，甚至促成了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那次会面没有带来传闻的恐怖“统一”，却带来了另一种想象：对话，也许比对抗更能保障安全。可惜，这个窗口很快关闭。香港抗争、北京强硬更加使“和平”成为政治禁词。如今的台湾政治风向，把“强化敌意”当成视为保卫民主的唯一途径，但现实是：没有和平，民主又能存活多久？好在与大陆不同，台湾政府建立在民选的基础

上，人民群众有绝对行使自己选票的权利进行坚定或是修正。

我对台湾的焦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在不同体制下对自由的不同追求。大陆被国家机器塑造成“不能说不”，台湾则被恐惧推向“不能说和”。这两种极端，映照着一个悲剧——恐惧取代了理性。

台湾的问题，不仅是台湾的，也是整个华语世界的。当民族始终被大国叙事牵引，无论是“统一”还是“独立”，都难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主体性的恢复，必须从拒绝被利用开始：既不被北京利用，也不被其他力量利用。

台湾不必成为谁的“棋子”，也不应被当作谁的“前哨”。在中美竞争升级的今天，台湾的当务之急，似乎不是等待援助，而是重新定义自身的安全逻辑。这并不意味着屈从中国，而是以更成熟的政治智慧，寻找能守护自由的现实路径。

台湾的未来，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出兵，也不取决于中国是否让步，而在于台湾社会能否勇敢地重新思考：自由，是靠武力守住的口号，还是靠理性谈出来的秩序？

我常看到一个讽刺的镜像：国际上谈自由，却会把它当成战略工具；中国谈统一，却能把它变成政治威胁；而真正为自由付出代价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夹缝中的人。

台湾的命运尚未注定。但历史终将属于那些，即便在恐惧之中，仍愿意保持清醒的人。



Taiwan: A Moment of Clarity Under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s

Growing up in mainland China taught me what repression feels like. It is not a sudden blow, but something that seeps into language, habits, and eventually the soul. That experience shaped my belief that respecting a people's right to decide their own destiny matters more than any nationalist slogan.

At a recent academic forum in California, a Taiwanese scholar remarked, "Ukraine today may be Taiwan tomorrow." The silence that followed reflected not exaggeration, but a shared awareness of East Asia's fragile reality. Many ordinary Taiwanese I later spoke with expressed a simple wish: peac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daily life. For them, peace is not an ideology, but a way of living.

For years, Taiwanese society has rest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international help would arrive if China attacked. That belief is increasingly fragile. US foreign policy today is driven less by moral obligation than by strategic calculation. Taiwan learned this lesson painfully in 1978, when Washington switch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Beijing. That moment remains etched in Taiwan's collective memory as a reminder of realpolitik.

Caught between reliance on US security support and caution toward Beijing, Taiwan now faces renewed uncertainty. Rising US-China rivalry and growing American isolationism have reinforced the sense that Taiwan may be treated more as a strategic chip than as a true partner. This echoes a longer Western tradition of viewing Asia through shifting lenses of utility and threat rather than genuine self-determination.

Internally, Taiwan'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eflects a deeper spread of fear: fear of annexation by China and fear of abandonment by the world. As a result, calls for dialogue are often dismissed as surrender. This logic is familiar to anyone raised under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where fear replaces reason. A free society's strength lies not in righteous hostility, but in the space it allows for rational choice.

Peace does not mean submission. It means retaining agency and negotiating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foundation allows its people to adjust course through elections. Ultimately, Taiwan's future will not be decided solely by Washington or Beijing, but by whether Taiwanese society can think clearly under pressure and refuse to let fear define its destin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器官移植大跃进

——丢失的孩子都去了哪里？

作者：周敏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中国近年儿童、少年频繁莫名丢失或死亡的消息，在民间的安全焦虑中占据了核心位置。2024年焦作一名12岁男孩晚上出门扔垃圾后失踪，当时穿拖鞋且没带手机和钱。各地都有学生在上学或放学途中失去踪迹。云南和四川有熊猫血学生在校离奇死亡。部分校内死亡案件中，家属反映学校拒绝交出尸体；校方以维护秩序为由封锁校园并快速处理遗体，相关司法鉴定和尸检程序未被公开披露。还有大量的毕业生和年轻人因招聘、旅游等被骗至缅甸、柬埔寨、泰国后失踪。此类种种事件不断发生，绝大多数都无法登上新闻或媒体平台。

中国拥有全球最密集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官方曾多次展示其在几分钟内定位特定人员的能力。然而在这种无死角的监控下，频繁发生的青少年失踪案件（如胡鑫宇案）往往陷入调查僵局，最终以极具争议的“自杀”结论结案。更令人费解的是，旨在帮助家长寻亲的公益平台如“宝贝回家”等网站近年来越发受到行政干扰，甚至被限制或关闭。部分寻亲家庭反映，他们的寻亲行动被有关部门视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大量家长在线上聚集、线下互助，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种政治定位极其灵敏、寻人极其迟钝的监控选择性失灵，让民众不得不产生最黑暗的联想：在网上打个字都被精准定位的环境下，一个大活人莫名蒸发，是真的无能，还是权力的默许？官方倾向于将失踪解释为离家出走或自杀，而民间寻亲者往往指向器官犯罪。

为何失踪或莫名死亡总是与器官移植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市场最令国际社会困惑的特征是，超短的等待时间与爆发式增长的手术量。合法自愿捐献的登记人数与实际完成的手术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用“自愿”来解释的缺口。

这种数据上的缺口，在民间舆论中转化为具体的恐惧：青少年莫名失踪与死亡。

2024年发生的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案，为这种恐惧提供了惨烈的注脚。罗留下的录音证据，直接指向了医疗系统内部非法获取、买卖人体器官的利益链。官方在2025年6月的通报中全盘否认了买卖器官的质疑，但家属披露的细节极具冲击力：一名实习医生收到医院以劳务费名义转账的40万元，这在医疗界极不寻常；罗生前留下的录音涉及非法收受获取器官费用及微信转账记录。罗医生以生命的代价揭示了在中国顶级医



疗机构中，器官的获取并非全部来自官方宣称的红十字会渠道，而是一条涉及地下中介、巨额现金流和权钱交易的秘密生产线。

异常的数据显示出无法对齐的供需鸿沟。这是一个极度复杂且缺乏公开透明数据的领域。近年官方宣称每年约1.5万例器官捐献（含大器官）。国际学术界和人权组织如ETAC和McCain Institute通过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床位周转率、手术室数量、医院财报、移植中心扩建速度及药品（环孢素等抗排异药）消耗量推测，实际手术量每年6万—10万例。

这里有一个关键矛盾点——等待时间。在实行成熟器官捐献体制的美英等国，肝脏、肾脏的平均等待时间通常3—5年。然而，中国多家移植中心（如湘雅、仁济、天津一中心等）曾公开宣称其等待时间仅需1-4周甚至“急诊移植”数小时内找到配型。在非活体器官捐献体系中，如此高效的配型概率在统计学上近乎神迹。除非后台存在一个庞大的、分型数据已经入库的活体供应库在随时等待订单。

收割链条上还有一个位于中国境外。国际刑警组织及联合国多名人权专家在公开报告中，多次指出，缅北及柬埔寨—缅甸边境地区长期存在针对外籍人员的大规模人口贩运、非法拘禁与酷刑行为，受害者中以中国公民居多。这些区域被多个国际机构列为高度封闭、执法真空与武装控制并存的灰色地带。

正是在这样一个已被确认的极端犯罪环境中，部分人权组织与从当地诈骗园区逃脱的幸存者进一步披露，在妙瓦底等地，存在可能涉及非法器官交易的地下活动传闻。幸存者证词称，一些失去“利用价值”的被拘禁者在被转卖或转移后下落不明。由于当地长期处于高度封

闭状态，外界难以进入展开独立调查，上述指控迄今仍缺乏公开、透明的国际调查加以核实。

然而，正是这种信息黑箱的存在，使得围绕这些地区的种种指控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与更严重侵害行为之间潜在关联的恐惧。

现在有必要就“按需摘取”这个模式进行深度论证。在正常的捐献体系如美国UNOS，器官来源于脑死亡或心死亡后的捐献。这就注定了随机性，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捐献者何时出现。而器官一旦离体，冷缺血时间极为短暂。心脏仅4—6小时，肝脏12—15小时，肾脏24—48小时。整个流程是发现供体——维护生命体征——确认脑死亡——配型比对——摘取——运输——植入。如果一个病人能确定在短期内预定到一个匹配的器官，这意味着：不是病人在等器官，而是器官供体在等病人。也就意味着后台存在一个巨大的、已经完成了DNA和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录入的数据库。那么这些供体处于什么状态呢？处于被剥夺自由且随时可以被调配的状态。他们可能身处监狱、看守所、强迫失踪状态或是被严密监控的群体。最后这个状态尤其恐怖。供体可能正常上学上班，但是数据一旦匹配，便会随时失踪。

如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曾标榜的，急诊移植可在数小时内找到器官供体，其医学含义更加恐怖。正常脑死亡是不可预测的。能保证在数小时内提供器官，意味着供体可以被随时安排死亡。在病人进入手术室的同时，供体就在同一家医院或极近的距离被“处理”。

罗医生举报的非法获取器官费用，正是这个黑市运作的润滑剂。获取费是给寻找和维持这些活体资源的地下中介、监狱或看守所的非法报酬。劳务费是给参与摘取的医生和协调员的封口费。

这种超高效率的配型背后，是覆盖全社会的生物数据采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规定，学生每年必须进行抽血体检，不然便无法入学、中考、高考。体检费用包含在学杂费中。在缺乏隐私保护和透明监管的环境下，这些涵盖血型、DNA信息的血液样本去向成谜。这是最令公众担心的一点。当孩子们的身体情况全部被数据化时，这套系统就具备了精准搜索的功

能。如果需要某个特定配型的器官，只需要在数据库中检索，就能迅速匹配。这不再是医疗关怀，而是生存风险。

2026年1月初，河南新蔡一所名为“清华园”的学校发生一起在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

据多位网民转述及家属在社交平台的说法，该学生在参加常规体检抽血后不久，于校内被发现身亡。家属在现场看到其身体存在异常痕迹，并对死亡原因提出强烈质疑，但校方随即以“维护秩序”为由封锁现场，相关情况未经过独立司法鉴定即被处理。目前，有关该事件的讨论帖文在网络上频繁遭到删除，真实死因至今未有公开、透明的说明。这种对真相的强力阻断，加剧了公众对普遍撒网、按需收割的深度焦虑。

当冰冷的算法在数据库里精准选中了那个鲜活的少年，当门口的鞋子再也等不到归家的人，我们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战栗——谁能保证，那台没有车牌号的收割机，下一个不会停在你我的家门口？让我们一起哀悼这个连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的黑暗纪元。

01/04/2026 周敏

China's Organ Transplant Surge: Where Have the Missing Children Gone

Reports of missing or unexplained deaths among children and youths in China have intensified public fear. Despite the world's densest surveillance network, many cases stall or end with disputed suicide findings, while family searches face administrative ob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transplant system shows an extreme mismatch between registered voluntary donations and rapidly expanding surgical volume, paired with unusually short waiting times measured in weeks or hours. Investigations and testimonies allege hidden supply chains, cash payments, and pressure within hospitals.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estimate far higher transplant numbers than official figures. Survivors and watchdogs also point to cross border trafficking zones in Southeast Asia, where detainees sometimes disappear. Together these patterns suggest a demand driven model in which pre typed biological data enables rapid matching, turning people into inventory. The absence of transparent audits, independent autopsies, and open data prevents verification and fuels alarm. This abstract examines the risks involv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1644 史观？ 1840 史观？ 我们需要 1911 史观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辨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争议风潮：一批人开始挑战官方“中国自古强大，都怪1840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近代衰落”这种叙事，称中国古代十分美好，只是因为“满清1644年入主中国，才导致了近代衰落”。

目前，这一争论，似正引起中共统战部和中共《解放军报》的互相攻讦，其中前者试图找一些御用文人，维护官方的“1840史观”和所谓“民族团结”叙事。而后者则似乎更钟情于更强硬的皇汉主义叙事，发表文章，提出不能只讲团结。

在笔者看来，无论1644还是1840史观，本质上都是伪概念，两者的争论也是一种伪争论。

事实上，中共所说的“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专制王朝史。从民权的角度看，这两千年里百姓从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夺取天下者都是靠杀伐、武断暴力上位，其身份也不外乎流氓（汉、明）、阴谋家（晋）、军头（隋唐、五代、宋）、北族（元清）这几类。事实上，这些人都可称之为“僭主”，与英国光荣革命后的立宪君主相比，毫无半点合法性可言！

当然，其中有些朝代的一些时候或许君权小一些，百姓说话的空间有那么一些。至于民众的结社自由，就算在两千年皇权政治的巅峰时代，也还是有一些的，不至于像如今中共时代那么极度严苛，这些当然都是宝贵的自由传统。但本质上，皇帝和“草民”政治权利悬殊，这一点两千年来不变。

所谓“1644史观”，就是吹捧“汉人皇帝”的时代，怀念能“做稳奴隶”的时代。

所谓“1840史观”，就是吹捧无论什么族裔的古代皇帝的“丰功伟绩”，怀念从秦皇汉武到雍正乾隆这些暴君。

1644史观称“没有满清，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1840史观称“没有西方，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更何况，两者实际上都试图推行一种为极端民族主义服务的“国耻教育”，即：树立一个“十恶不赦的外敌”作为靶子，试图唤起皇汉、粉红等各路炮灰的“同仇敌忾”。可以说，两者没什么真正的不同。

此外，两者同样反西方，其中前者（1644史观）加上了“满人”这个“敌人”，试图推行极端皇汉主义，试

图把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推广到更多族群。后者（1840史观）则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官史，用于维护中共所谓“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合法性”，为中共继续奴役民众添砖加瓦。（当然，笔者观察到，也有一些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在借助1644史观借古讽今，以清拟共，这种现象要另作讨论，在此不展开讲了。）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史观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1911史观。

1911年的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的并非简简单单一个清朝，而是一场对两千年僭主皇权的否定，亦是一次跳出朝代循环死局的重大尝试。1911开启的时代，有约法与制宪的努力，有司法独立的伟业，有民众投入宪政选举的热忱，有地方自治及民族自决风潮，如1913年藏人的民族自决就是正常民族自决的典型。中共鼓吹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治”则是一种伪自决，本质上是为其最终颠覆全世界自由服务的一步棋而已……这个时代，固然有种种野心家试图重建帝制、重建专制的企图，更有苏联这一赤色恶魔竭尽全力的颠覆活动，但依然存在着无数人为捍卫民权所作的非凡努力，仍然存在着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仍然存在着向良好政治发展的可能路径。那时，人们似乎真的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政府、政体、生活方式。这种良好路径可能性的存在，是民国史的最大意义。

尽管今日，中共已扼杀了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且在其统治之下，人们陷入了“1644史观”vs“1840史观”的伪争论。然而，如果我们真正重新审视历史，以民众为思考的本位，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1644史观和1840史观大同小异，只有1911史观才是我们需要的

The 1644 View of History? The 1840 View? We Need the 1911 View

This essay contends that both the 1644 and 1840 historical narratives are false debates that ultimately justify autocratic rule by shifting blame to external forces. Neither challenges imperial despotism itself. The 1911 view, centered on the Xinhai Revolution, represents a true break from two thousand years of autocracy and affirms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神也必须“听话”

——中国权力结构下的信仰困境

作者：程筱筱

编辑：冯仍 校对：林小龙 翻译：戈冰



在英文世界里，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许多西方观察者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更关键的事实：现代政治并不是让中国人变得“无信仰”，而是让人变得“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人间秩序，哪怕其对象是神。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忏悔、服从并等待赦免，终极裁决权明确属于神。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这并非叙事风格的差异，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分野：一个文明承认终极判断来自超越权威，另一个文明则默认人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后责任。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社会并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的对象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这种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更加直白。在许多中

国人的经验中，拜神更像是在“办事”。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人们很少反思自身是否偏离信仰，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你若无效，就失去被尊敬的资格。这并非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秩序之上。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一种功能型工具，它便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显得突兀。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而是试图接管信仰：你可以信，但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你可以祷告，但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真正被视为威胁的，从来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非因为规模或组织形式，而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最终判断与良知标准。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天然构成威胁。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便必然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历史反复证明，试图将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信仰被掏空，或转入地下，以更顽强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拥有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也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剩下的就只能是强制。在这样的结构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就必然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 Gloria 画展有感

作者：何愚
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2025年11月29日上午10点，我与朱虞夫先生、曾群兰女士等友人一同前往位于La Puente的“六四”纪念博物馆。洛杉矶的十一月空气清新宜人，但当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走近那些揭露中共邪恶的画作时，心情却愈发沉重。这些作品出自艺术家Gloria及其丈夫Jin之手，既充满讽刺与现实意义，又不乏幽默。Gloria夫妇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忧虑令我印象深刻。尤其这幅讽刺中共和习近平妄图统治全球乃至全人类的画作，我将其称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后令人不寒而栗，深感警醒。

画中揭示了习近平试图以“武汉病毒”为手段，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捆绑在一根铁索之上，如同铁链女般，这样他就可以让自己高枕无忧并“活到一百五十岁”。这看似荒谬，实则令人恐惧——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三年疫情，从最初的隐瞒到后来的放任扩散，全球在短短数月内陷入紧急状态，几乎无一幸免。紧接着，他亲自部署、指挥，将中国的口罩销往世界各地，让N95口罩从医护专用品变为全球标配。他还将管理新疆人的极端手段，悄然推广至世界每个角落，在各国政府和人民毫无防备之时悄然实施。据世卫组织估计显示，仅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这次灾难造成全世界逾1490万人死亡。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掌握在上帝手中，疫情终将过去，世界秩序得以恢复，邪恶势力终将被抛弃。中国人的苦难虽未终结，但我相信，这既是转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中国人在觉醒，世界也在觉醒。

回望七十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塑造出一个与世界隔绝的铁桶社会。

建政初期，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巩固权力，以“革命”之名推动社会改造，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与阻碍，进行系统性清除。中国人失去了文化与信仰的依托，取而代之的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空洞口号。在高强度洗脑和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国人逐渐沦为可操控的“人肉电池”，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政权。

随后的阶级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让政治高压和社会动员成为常态，经济则在浮夸与失序中陷入衰退。1989年的抗议，是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最终却以武力镇压和屠杀收场。全世界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中国人已在饥饿、死亡、监禁与孤立中麻木，难以再抗争。

事件之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视为延续政权的关键。中国人为中共续命一代代付出牺牲，成为体制的“螺丝钉”。经济发展带来更严密的思想与行为控制，现代科技巨资打造的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只能听一种声音、看一个图像。街道和社区监控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十户一长，从生活细节到情感变化无所不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俨然成了巨大的监狱，行走其间的公民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改革开放的确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制造业的崛起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矛盾的加剧和价值体系的断裂也随之而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并未带来制度上的同步开放，反而催生了一种依赖经济增长却压制社会表达的畸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导致倒退。随着大型外企不断撤资，失业人口持续增加，社会的不安情绪逐渐蔓延。尽管中共不断出台各类预防措施，试图阻止农民返乡等现象，但在我看来，中国已然站在了一个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风口之上。

进入习近平时代，官方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将其包装为全球合作的新愿景。然而，在许多人眼中，这更像是将国内治理模式向外延伸的工具。在“一带一路”政策遭遇失败后，习近平已然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却仍以极权体制为依托，试图通过病毒控制全人类，令全球人民在三年疫情中饱受苦难。

这一理念强调话语权主导、政治统一和制度自信，却刻意回避权力监督与个人自由。当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瓶颈时，这种外向叙事成为新的政治工具，用以扩大影响力，同时缓解内部压力。

回顾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驱动，还是习近平的全球叙事，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权力的维系展开。尽管各阶段的策略和口号不断变化，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未变。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逻辑带来的并非所谓的共同命运，而是持续不断的结构性束缚。



中共建立在谎言之上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直欺骗某些人，
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没有哪一个政权能永远靠谎言维系，但中共却试图用谎言去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由假新闻、假繁荣、假数据、假承诺所堆砌的幻象国度。中共在政治口号中塑造“伟光正”的形象，在信息审查中封锁真相的裂缝，在舆论机器里制造“人民幸福”的幻觉。可当谎言成为日常语言，真相便成了政治禁忌，而整个国家，也在信任崩塌中缓缓腐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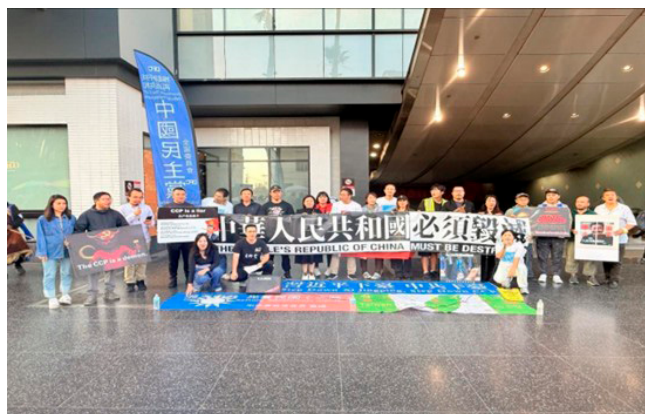
一个政权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它能否让人民相信它的正当性，而中共早已耗尽了这种“政治公信力”。它的医疗体系以“全民医保”为幌子，掩盖资源被权利垄断的事实；它的养老制度以“幸福晚年”为旗号，却让老人们在通胀与谎报中艰难求生；一切制度都在共同编织一场巨大的政治幻觉。

在这个幻觉中，人民被教育去“感恩”虚假的繁荣，被鼓励去“相信”被扭曲的现实。当一个国家以欺骗为常态，它不只是丧失了道德基础，更是在自掘坟墓。因为没有任何谎言能永远取代真相；当信任的最后一根弦被拉断，崩塌的不只是政权的形象，而是整个社会的灵魂。

中共最擅长的，是把苦难包装成成就，把失败装饰成胜利。在医疗领域，这种谎言达到了病态的精致程度。中共宣称“全民医保”“健康中国”，在宣传片里，医生微笑、病人感恩、制度完美无缺；但现实中的医院门口，却是病人无助的哭声、家属的绝望与医疗账单的重压。

所谓“全民医保”，在本质上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医保报销比例被层层稀释，药价虚高，基层医疗体系早已被权利和资本联手掏空。那些被宣传成“免费”的项目，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的腐败。对底层百姓而言，看一次病，就是一次家庭经济的坍塌。在“人民健康”的口号下，健康早已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属福利。

疫情期间，更暴露了这一体制的谎言本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共选择的不是透明与科学，而是掩盖与欺骗。从最初的封锁信息到强制“清零”的荒唐执行，无数生命在谎言中消失。数据被篡改，死亡被隐瞒，媒体被噤声，医生被“约谈”。那些敢说真话的专业人士，不



是被追责就是被消失；而那些制造假象的人，却在新闻镜头前被赞为“英雄”。

医疗体系的腐败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道德层面。医生与患者之间失去了信任，公立医院成了逐利机器，医护人员工作有了KPI，医患关系被毒化。中共的医疗政策，已经从保障民生的制度，堕落为维稳的工具。它所追求的“稳定”，不是人民健康，而是维持政治形象。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人权，而是被权利过滤后的政治数字。

当政府谎报疫情数字，当病人无法知道真相，当“生命”被简化为政绩曲线的一个变量，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就已经死亡。中共可以用宣传控制舆论，却无法控制人们亲身感受到的痛苦；可以篡改报告，却无法掩盖医院走廊里一张张等不到治疗的面孔。

谎言的毒，不仅腐蚀了制度，也腐蚀了人心。一个政权若连“生命的价值”都可以欺骗，那么它已经不是失误，而是犯罪。中共的医疗神话，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对人类尊严的冷血嘲弄。

在中共的宣传中，老人是“被党温暖守护的一代”，是“国家进步的见证者”。然而，现实中的中国老人，正在经历一种悄无声息的绝望。那种“幸福晚年”的幻象，只存在于中共的宣传片里，而不在空荡的养老金账户中。

中国的养老体系，是谎言与透支叠加的产物。官方反复宣称“养老金发放有保障”，可财政赤字现实无人能否认。许多地方政府已偷偷挪用养老金补财政窟窿，年轻人被迫用更高的税负去支撑一个濒临破产的系统，而他们自己却知道，等他们老了，或许连这点保障都不

会存在。这是一个用未来抵押现实、用谎言掩盖崩塌的制度。

中共的社会保障体系，本质上并不为民众服务，而是为政治稳定服务。养老金、医保、低保、补贴，这些原本该属于公共责任的项目，都被权利染上了“政治筛选”的色彩：能顺从者得益，敢质疑者被边缘化。一个政权若连“养老”都要纳入忠诚考核，那它所谓的“人民政府”，实际上只是掌控生老病死的冷漠管理者。

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地区不均、物价飞涨、医疗负担叠加，让无数老人陷入生活的边缘。有人卖废品补贴生活费药费；有人靠子女借贷做手术，有人独自死在出租屋内数月无人问津。而政府却在媒体上宣扬“银发经济”“老有所养”的政绩。

养老金的数字可以造假，但老人脸上的皱纹不会。那些被掩盖的痛苦，终将在时间的裂缝中暴露。中共可以通过宣传掩饰财政危机，却掩盖不了人心的寒凉。一个连老人都不敢老的国家，一个让人害怕变老的社会，是人性被侮辱的地方。

真正的“幸福晚年”，不来自口号，而来自制度的诚实、政府的责任与社会的信任。而当这些都被谎言所取代时，所谓的“晚年幸福”，就成了荒诞剧的一幕。中共的养老神话，不过是一场集体催眠：让人们在麻木与恐惧中等待老去，在失望与谎言中走向终点。

一个政权，可以靠谎言延长寿命，却无法靠谎言获得永生。

因为谎言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它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直到整个体系陷入疯狂。

真相或许会被掩盖，但它不会被消灭；信任或许被摧毁，但它终将成为复苏的起点。中共之所以畏惧真相，不是因为真相会让它立刻崩塌，而是因为真相会让人民学会思考——而思考，才是独裁者最害怕的力量。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Built on Lie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t tempted to construct an entire system of rule on sustained deception. Drawing on the idea commonly attributed to Abraham Lincoln that lies cannot deceive everyone forever, it contends that the CCP has relied on false narratives, manipulated data, and controlled information to fabricate an image of legitimacy, prosperity, and popular support. Over time, however, this strategy has exhausted the regime's political credibility.

The text examines how deception operates across key governance areas, particularly healthcare and social welfare. Official slogans such as "universal healthcare" and "happy retirement" are presented as political symbols rather than lived realities. In practice, rising medical costs, distorted insurance coverage, unequal access to care, and widespread corruption undermine these promises. During public health crises, especially the pandemic, the regime prioritized information suppression and political image management over transparency and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Whistleblowers were silenced, data were obscured,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as subordinated to propaganda needs.

The essay further argues that deception corrodes not only institutions but also social trust. When citizens are taught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artificial achievements and accept distorted realities as normal, truth itself becomes dangerous. In such an environment, suffering is reframed as success, failure is presented as victory, and loyalty becomes the condition for access to basic protections. Healthcare and pensions, instead of functioning as social rights, become tools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ontrol.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nsion system highlights a similar pattern. Official assurances of long term security conflict with fiscal strain, demographic decline, and the diversion of funds by local authorities.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forced to subsidize a system they no longer trust, while older citizens face inflation, inadequate benefits, and growing insecurity. The gap between propaganda and lived experience continues to widen.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while a regime may prolong its existence through deception, it cannot secure lasting legitimacy. Lies require constant reinforcement, creating a cycle of denial that ultimately leads to institutional decay. Truth may be delayed, but it cannot be erased. The CCP fears truth not because it guarantees immediate collapse, but because it encourages independent thought.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essay argues,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authoritarian pow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羅刹海市

作者：胡景
责任编辑：侯改英 翻译：周敏

在地球的某个地方
昏黄混沌
没有一丝光线
没有春天

人民
听不到天使的呼唤
它们
阻隔了人民的呐喊
一道屏障
隔着地与天
天堂遥远
地狱却近在眼前

它们的恶没有下限
它们坏的无法无天
好人被践踏
坏人乐无边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真个是
光怪陆离罗刹殿
清白难以立中间

看它们
个个以为自己是
琵琶琴瑟八大王
王王在上
实则不过是
魑魅魍魉四小鬼
鬼鬼犯边

劝它们
恶行尽数收敛
回头方是岸
待到民众觉醒时
等着它们的
必是声讨和推翻

纪念刘晓波先生

作者：瞿成松
编辑：韩立华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纪念刘晓波先生：七十岁，且永远年轻
天堂的风吹过，没有年龄，没有监狱，没有死亡。
你依然年轻，且将永远年轻。

你的“年轻”，不是岁月的数字，而是良心的光亮；不是身体的存在，而是精神的不朽。你的一生，被铁窗围困，却从未被恐惧驯服；被权力审判，却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你用温和而坚定的语言，证明了一个简单却被反复否认的事实：人，可以在不仇恨的情况下，拒绝谎言；可以在不暴力的前提下，对抗专制。

你所反对的，并不是某个民族，而是极权；不是某群人民，而是谎言。你用“没有敌人”的胸怀，照亮了一个被恐惧统治的时代。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惧怕你——惧怕一个不肯跪下的良心，惧怕一个不以仇恨回应仇恨的灵魂。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监狱关得住身体，却关不住思想；权力可以夺走生命，却夺不走尊严。你被囚禁的每一天，都是对迫害者的审判；你被噤声的每一刻，都让更多人学会发声。你的名字，成为良心的同义词；你的沉默，胜过万千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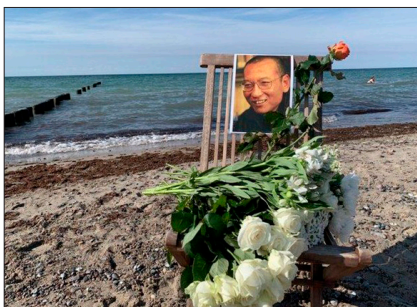
今天纪念你，不是为了哀伤，而是为了继承。继承你对自由的坚持、对真理的忠诚、对暴力的拒绝。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对极权、反对迫害、反对谎言，是每一个有良心之人的责任；亲近极权、为迫害辩护，是可耻的；坚持反对极权、以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是光荣的。这不是仇恨的选择，而是道德的选择；不是破坏的冲动，而是文明的自救。

你曾说，希望未来的中国没有恐惧。我们也相信，那一天会到来。不是靠报复，而是靠真理；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勇气；不是靠遗忘，而是靠记忆。记住你，就是记住人何以为人。

刘晓波先生，今天你七十岁。
天堂的风吹过，没有年龄，没有监狱，没有死亡。
你依然年轻，且将永远年轻。

（瞿成松 中国民主党党员 中国暴政观察创办人）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

第 21 期 (2026 年 1 月 5 日)

作者：张维清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本期介绍被迫害事件：中共跨国镇压、暴力袭击海外异见人士，造成严重伤害，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一、事件背景

中共长期监控、恐吓、伤害海外异见人士。中国民主党海外党员多次受到中共的跨国镇压。2026年1月4日下午，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公共区域，包括中国民主党员在内的各界民运人士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中国独裁者习近平暴政。

二、事件起因

当天，中国洛杉矶领事馆雇佣的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多次威胁、恐吓民运人士，破坏、阻住抗议集会，不允许大家在领事馆前的公共区域举行和平的抗议集会。

三、挑衅、威胁、恐吓

这位中共雇佣的安保人员，用手比划成“手枪”的形状，对着民运人士的头，先后共四次质问、恐吓：“你能死三回吗？”。多次威胁党员：“你到我身后来，我三个人一起干你”。要求一位带着眼镜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摘掉眼镜，以便他使用辣椒水对其进行攻击。

民运人士始终保持克制，多次耐心提醒他，“这是公共区域，你没有权利限制我们的和平抗议。”

四、迫害、攻击过程

这个安保，再次试图限制党员的言论自由，不允许党员讲话发声，多次威胁党员“（你们）再说话，我就不客气了”，看到党员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后，他恼羞成怒，先后对四人使用辣椒水进行攻击。同时威胁其他人“不准走”，绕过花坛，冲到马路上，对马路上的其他人员也用辣椒水进行攻击。期间，民运人士一直非常克制。

五、警方介入与逮捕

事件发生后，洛杉矶奥林匹克分局（Olympic Station）警察迅速赶到现场逮捕了这名安保人员，并定性为重罪。

六、造成伤害

多位集会人员的眼睛受到严重伤害，其中一人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这次事件，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又一罪证，该嫌疑人使用辣椒水对中国民主党员等人士的攻击行为已涉及“使用致命武器攻击”、“暴力袭击”以及“非法冒充执法人员”等多项重罪。中国民主党一直抗争在反独裁、反暴政的第一线，自中国民主党1998年6月25日成立之日起，中共持续不断地抓捕中国民主党党员，先后有几百名党员被中共抓捕，现在不少党员还在狱中。中共长期监控、恐吓、伤害海外异见人士，中国民主党海外党员多次受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但是，这阻止不了中国民主党人对中国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对结束一党专制的奋斗。共产党一日不下台，我们一日不停止抗争。《在野党》人权观察部严厉谴责中共的无耻罪恶行径，呼吁中共政权停止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人权组织持续关注本次事件，并追责。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民运人士集会声援黎智英

—— 抗议中共国安法摧毁香港繁荣 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讯：2025年12月21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以《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民主人士、壹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作出有罪判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黎智英，并释放所有因言获罪、因和平表达而被关押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本次集会以“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黎智英！民主英雄无罪！独裁暴政有罪！”为主题，吸引多位中国民主党党员、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到场参与。现场气氛庄重而坚定，抗议者持续向外界传递反对中共极权、捍卫自由法治的明确立场。

政治判决震动国际社会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78岁的黎智英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名成立。该案被广泛视为一宗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是中共借《国安法》之名，对香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社会良知实施系统性清算的标志性事件。

黎智英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公开反对中共暴政，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长期坚持报道“六·四”真相、揭露专制体制、支持香港民主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多次走上街头声援抗争者。2020年被捕后，壹传媒资产被冻结，《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香港言论自由由此遭受重创。

集会发言：为自由与未来发声

本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女士主持。她在开场发言中指出，黎智英本可尽享自由与财富，却因选择良知与信念失去了自由，这种牺牲本身已揭示判决的不公正。她强调，坚持良知不是罪行，今天的抗议不仅是为了黎智英，更是为了所有被囚禁的良心犯。

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旧金山支部党员李栩在发言中指出，12月15日的判决不是司法，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黎智英唯一的“罪行”，就是坚持自由、捍卫新闻、说出真相。“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香港法律正被扭曲为镇压工具。他呼吁社会拒绝沉默，停止纵容中共的政治审判，还香港自由，还中国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在发言中指出，黎智英是民主英雄，是香港自由精神的重要象征。中共对其长期关



押，是对人权与法治的公然践踏。他强调，习近平利用《国安法》将个人政治意志包装成法律工具，对黎智英的定罪不是普通司法案件，而是香港的耻辱，是法治被系统性摧毁的铁证，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恐吓与示范。

国际友人、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亲历者：赛颂菲（Valerie Sansome）在现场表示，香港长期被视为自由与机会的灯塔，许多人为此给予了极大支持。黎智英深刻理解香港的价值，并清楚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却依然选择挺身而出。她强调，尊重黎智英的选择，是对人权与自由最基本的承认，只要有机会，人们就应站出来，永远不要放弃。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指出，香港过去的经济与国际地位，建立在民主、法治与自由基础之上，也正因为有黎智英这样的人，通过媒体传播自由思想，与世界民主国家接轨。中共一方面将黎智英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却妄想复制香港模式建立所谓“海南自由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小静在发言中表示，人们站出来抗议，并非出于对抗的偏好，而是被迫不能再沉默。她指出，黎智英不是罪犯，真正有罪的是把法律变成武器、用《国安法》囚禁思想的独裁制度。她强调，没有自由的安全是谎言，没有法治的稳定是暴力，为了下一代不再恐惧，人们必须发声。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表示，香港曾是自由民主、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国安法》实施后，自由、民主与人权迅速消失。中共借法律之名肆意抓捕、践踏

人权，害怕真相，因此必须被揭露。他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对其进行制裁，并要求立即释放黎智英及所有政治犯、良心犯。

民主人士袁强在发言中指出，呼吁释放黎智英并非只为了一个人，而是关乎一个民族是否仍有未来。他强调，一个社会若连说真话、和平表达都要被送进监狱，那么被囚禁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良知。释放黎智英，是向下一代明确宣示：讲真话不是罪，坚持良知不是罪。

为时代良知作结

集会最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发言指出，黎智英案件早已超越香港本地事务，成为对全世界的警讯。当极权可以随意定义“犯罪”，法律便不再是正义的工具。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以沉默换取虚假的稳定，不要遗忘一位因信念而入狱的老人。

抗议仍在继续

集会期间，抗议者多次高呼“释放黎智英”“释放所有良心犯”“还我人权、还我民主、还我自由”等口号。主办方表示，将持续以和平方式发声，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人权危机。

正如现场多位发言人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政权害怕文字、记者与人民时，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而黎智英，正是这个时代良知的象征。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赛颂菲等（国际友人三人），缪青，刘静涛，关永杰，庄帆，陈森峰，郭志军，何聪，高应芬，李树青，卫仁喜，汪峰，李小林，高俊影，袁强，郭超，周志刚，吕小静，卢占强，韩锦瑞，郭鉴鑫，曾德泰（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民主党党员 活动主持人高应芬



活动组织者之一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翔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



国际友人、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亲历者：赛颂菲 (Valerie Sansome)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小静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小林



民主人士袁强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 本次集会发起人 缪青

摄影：关永杰

San Francisco Democracy Activists Rally in Support of Jimmy Lai Protesting the CCP's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Destroying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a public protest held on December 21, 2025,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by the San Francisco branch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The protest strongly condem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using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impose political convictions on Hong Kong democracy advocates, including media entrepreneur and Apple Daily founder Jimmy Lai. Participants demanded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Jimmy Lai and all individuals imprisoned for speech, peaceful expression, or conscience.

The demonstration was organized under the theme "Release Jimmy Lai Immediately, Democracy Heroes Are Innocent, Dictatorship Is Guilt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attended. Protesters emphasized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ule and expressed firm support for freedom,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The atmosphere was solemn, determined, and openly critical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Speakers focused on the December 15, 2025 verdict by the Hong Kong High Court, which convicted the seventy eight year old Jimmy Lai of conspiracy to collude with foreign forces and conspiracy to publish seditious materials. The ruling was widely characterized as a political trial rather than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decision, symbolizing the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civil liberties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Participants stressed that Jimmy Lai chose conscience over personal safety and wealth, making his imprisonment a clear example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Several speakers argued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 turned Hong Kong law into a tool of repression, criminalizing dissent, journalism, and peaceful expression. They stated tha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effectively collapsed.

International speakers, including witnesses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described Hong Kong as a former beacon of freedom now facing systematic dismantling. The protest concluded with chants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ur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ject silence in exchange for false stability. Organizers pledged to continue peaceful actions to expose the ongoing human rights crisis in Hong Kong.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以笔尖微光，守护高墙内的良知

—— 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年度会议

作者：周敏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年度会议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隆重举行。

在岁末寒冬之际，来自各界的活动人士与支持者齐聚一堂，共同延续了一项充满温情的传统——为身处困境的中国良心犯书写圣诞贺卡。

会议现场，墙上的历史照片与手中的贺卡相互映照。与会者们神情庄重，在卡片上逐字写下对受难者的牵挂。这些卡片不仅是节日问候，更是对那些在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孤胆英雄们的致敬。

在书写过程中，大家首先想到了彭立发（彭载舟）先生。自四通桥一桥孤勇、点燃民意火炬以来，他至今处于强迫失踪状态。与会者在卡片上表达了对这位平民英雄的崇高敬意。虽然不知这些文字能否避过严密的封锁送到他手中，但大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他在桥上的呐喊，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回荡，世界从未忘记他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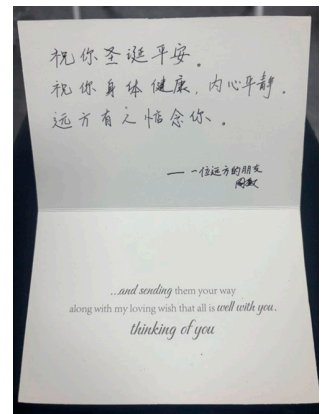
随后，王炳章博士的孙女也在会上动情发言。作为中国现代民运的开拓者，王炳章博士已被关押超过二十年。孙女的发言诉说了家族跨越三代的思念与坚守，令现场许多人眼含热泪。这份跨越二十载、经由孙辈传递的薪火，证明了追求自由的理想不仅不会被铁窗隔绝，更在代际之间生根发芽。

此外，与会者也纷纷为许志永与秦永敏两位长期奋斗的法律与民权学者写下祝福。许志永博士因倡导新公民运动而遭受重判，他在法庭上对“美好中国”的描绘

依然激励着后来者；而秦永敏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民运的“活化石”，其一生数次入狱、累计服刑长达三十余年，他那百折不挠的韧性，正是中国民间抗争精神的缩影。

虽然这份圣诞问候是寄往当下的，但现场的思绪也难免飘向了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尽管刘晓波已无法亲手拆开这些贺卡，但他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非暴力抗争精神，依然是支撑大家在黑暗中前行的动力。大家感叹，今天人们手中的每一支笔，其实都是在延续他的愿望——让文字不再成为罪名，让自由之花在故土绽放。

“人道中国”负责人表示，年度寄卡活动旨在打破孤独。在这个团圆的季节，这些凝聚了国际社会关注的文字将化作微光，试图照亮那些最寒冷的角落，守护那份尚未熄灭的良知之火。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夏威夷民主党员国际人权日活动纪实

作者：王礼华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正值第76个“国际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数名中国民主党党员，自发组织在夏威夷檀香山中国城孙中山铜像前举行庄严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呼吁：关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追责中共当局长期、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责任。

当天下午2点，参与者手持“追责中共”“追求人权不是犯罪”“中共停止迫害人权”等标语牌，以及写有“中国民主党呼吁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字样的横幅，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肃立。阳光洒在孙中山先生慈祥而坚毅的铜像上，海风拂过，大家神情肃穆，齐声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还我人权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共不等于中国！”口号声在唐人街回荡，引来众多华侨、游客和当地居民驻足围观，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斌率先发言指出，自己曾在国内目睹了大量令人发指的人权侵害的案例，而既然自己已经踏上自由的土地，就一定要勇敢为自由和人权站发声，为那些在狱中的人权斗士而呐喊，为他们早日重获自由而奋力疾呼，中共一天不释放他们，我们就永不停止！”

身着“Stand with Hongkong”黑色T恤，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支部主任张小驹先生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并在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指出：“今天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纪念日，旨在推广与倡导人权。然而今天，中国竟然身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之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权每天都在系统性地侵犯人权。直到今天，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依旧层出不穷。不仅如此，中共甚至还将这些压制手段和经验向世界输出，今日的香港就是鲜明的例子。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控诉中共这种倒行逆施、肆意践踏人权的行径。”

随后，他带领在场人士高喊口号：“Hold CCP Accountable！”

夏威夷党部主任孟家虎先生最后愤慨陈词，他说：支持联合国对新疆反人类罪指控展开正式调查，不让真相被遗忘；对参与严重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与实体实施精准制裁；为中国境内仍坚持发声的人权捍卫者提供紧急庇护与支持；拒绝承认任何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质消灭公民社会与新闻自由的法律与做法。历史一再证明：对暴政的沉默，就是对下一个受害者的背叛。

活动持续近1个半小时，和平理性、吸引了众多当地华侨、市民及各国游客驻足观看、拍照录像。不少路人甚至当场鼓掌表示支持，有人高喊“Free China”以表声援！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部在活动结束时发表声明：

“在国际民主日这一天，我们向全球关心人权的人士发出呼吁：请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中国人权事业，一起推动对中共人权侵犯的追责！”



吕斌发表现场演讲



孟家虎发表现场演讲



张小驹发表现场演讲

A Record of the Hawaii Democracy Par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Event

On December 10, 2025,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s held a peaceful rally in Honolulu to mark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condemning CCP human rights abuses,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and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圣诞节旧金山抗议中共迫害基督教

——信仰、良知与民主的共同控诉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讯] 2025年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前，湾区多位基督徒、中国民主党党员及人权关注人士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共长期、系统性迫害基督教与家庭教会，要求立即释放因信仰被捕的牧师、传道人与信徒。

在全球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象征爱与救赎的圣诞节当天，中国大陆却仍持续发生对基督徒的抓捕、判刑与暴力清剿。抗议者指出，这一现实构成对宗教自由、人权原则与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践踏。

背景：从“宗教管理”到“信仰清剿”

与会者普遍指出，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宗教的政策已从有限容忍转向系统性镇压：家庭教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讲道、奉献、聚会被刑事化，牧者被长期羁押，未成年人被全面禁止接触宗教信仰。

2025年10月发生在广西北海的锡安教会全国性抓捕行动，以及随后浙江温州、云南、山西等地针对家庭教会的大规模执法，被视为新一轮宗教高压政策的集中体现。

高应芬：信仰自由本不该成为抗议对象

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公共事务与宗教自由倡议人士高应芬女士主持。她指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一个本不需要抗议的问题——信仰自由。但正因为迫害仍在继续，我们不能沉默。”

她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基督徒的真实处境，不应再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回避责任。

缪青：迫害信仰，是极权对良知的恐惧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记者、本次活动发起人之一缪青在发言中指出，中共打压宗教的本质，是对一切不受政权控制之价值体系的恐惧。“一个连祷告都要监控、连讲道都要入罪的政权，注定与自由、尊严和文明为敌。”

他强调，宗教信仰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社会良知的底线。

郭梅：北海锡安教会事件令家乡蒙羞

来自广西北海的家庭教会基督徒郭梅女士，简要回顾了锡安教会遭全国性扫荡的事实。她表示，这一事件



不仅震惊国际社会，也让她的家乡因迫害信仰而蒙羞。

她指出，自己早年在北海参与的家庭教会亦曾被取缔，牧者被带走、信徒被恐吓驱散。她呼吁立即释放金明日牧师及所有因信仰被捕的基督徒，并强调信仰自由不可侵犯。

郭志军：中共迫害基督教是一条延续数十年的链条

中国民主党党员、基督徒、“一人一推关注良心犯”行动发起人郭志军，从历史角度指出，中共对基督教的迫害并非偶发，而是自建政以来持续至今。

他提及王明道牧师、文革时期的宗教浩劫，以及近年秋雨教会、锡安教会和温州家庭教会案件，强调迫害在习近平时期明显升级，并在现场带领简短祷告，为受迫害者呼求公义。

陈怀罗：还我们信仰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怀罗表示，圣诞节站在中国领事馆前，本身就是对极权最直接的道德控诉。

他呼吁释放锡安教会信徒，支持多元信仰，并明确反对中共以政治权力打压异见与宗教群体的统治方式。

蒋书清：三代基督徒家庭的见证与民主主张

中国民主党党员、基督徒蒋书清的发言引发现场强烈共鸣。

蒋书清表示，近年来他亲历国内宗教环境的急剧恶化：十字架被拆除，未成年人被禁止敬拜，牧者遭恐吓、拘押，家庭聚会点难以生存。

蒋书清指出，这一切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独裁体制下，法律无法制约权力，公民权利缺乏保障。

刘忱忱：迫害信仰的体制终将被审判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忱忱在发言中指出，任何将自身凌驾于信仰与良心之上的体制，终将接受历史与正义的审判。他要求结束对宗教群体的系统性迫害，追究相关责任。

结语：这是圣诞节的见证，也是良知的控诉

主办方在声明中强调，中共对基督教的系统性迫害，已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也彻底暴露其所谓“宗教信仰自由”的虚假本质。

在寒风与细雨中，抗议者以行动表明：信仰无罪，迫害有罪；沉默是纵容，发声是责任。

这场圣诞节的抗议，不仅是一场集会，更是一份写给历史的证词。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缪青，刘静涛，李树青，陈森峰，郭梅，高应芬，吕小静，卫仁喜，卢占强，陈怀罗，郭志军，刘忱忱，蒋书清，郭超（排名不分先后）

Christmas Protest in San Francisco Against CCP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A Joint Indictment by Faith, Conscience, and Democracy

On December 25, 2025, Christmas Day, Christian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o prote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ystematic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house churches. The demonstration condemned arrests, imprisonment, and harassment of pastors, preachers, and believers, and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l individuals detained solely for their faith.

Protesters emphasized the deep irony that while the world marked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as a symbol of love and redemption,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continued to face surveillance, criminalization, and violent suppression. Speakers noted that under Xi Jinping, CCP religious policy has shifted from limited tolerance to comprehensive repression. House churches are labeled illegal organizations, sermons and gatherings are criminalized, donations are treated as offenses, and minors are banned from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s cited the nationwide crackdown on Beihai Zion Church in October 2025, as well as large scale enforcement actions in Zhejiang, Yunnan, and Shanxi, as evidence of an intensified campaign against independent Christian communities. Speakers stressed that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not incidental but part of a long historical pattern extending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CCP rule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to the present.

Organizers and speakers argued that the CCP fears religious belief because it represents a moral and spiritual authority beyond state control. Faith, they said, is not an enemy of society but a foundation of conscience and human dignity. Several speakers shared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urch closures, forced dispersals, intimidation, and detention of clergy and believers.

The protest concluded with a statement affirming that the CCP's actions violate Article 18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sters declared that faith is not a crime, persecution is, and silence enables oppression. The Christmas demonstration, they emphasized, was not only a protest but a moral testimony recorded for hist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洛杉矶，一群香港人把“未来”重新摆上桌面

——香港自民党成立现场纪实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周敏



发起人廖文浩阐述政治愿景；右侧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

时间：2025年12月27日 | 地点：1300 John Reed Ct,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12月27日下午，City of Industry 的会场里坐着两排人。前排多是流亡港人，约二十位；后排与两侧则是声援团体成员，约三十位。舞台背景板上用中英双语写着：“香港自民党成立暨香港未来研讨会”。灯光打在那行字上，像把一个曾经被迫沉默的议题，硬生生重新照亮。

这场活动的核心不是“仪式感”，而是“恢复发声”。对许多人而言，香港的政治空间早已被挤压到几乎无处落脚：政党解散、媒体噤声、公共表达被定性为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成立”本身变成了一句宣告——不是庆典，而是拒绝消音。

发起人廖文浩在台上阐述政治愿景。他回顾香港在1997年后逐步恶化的处境，并将2020年《国安法》视作分水岭：自由法治从此急剧倒退，朋友入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许多人只能离开家园。他把这种变化称为对承诺的背弃与对社会的清算。

当天，活动现场发布《香港自由民主党（HKLDP）创党宣言》。宣言的措辞强硬，但结构清晰，几乎是按“行动清单”写成：其一，主张以“国际线”推动外交游说与公共倡议；其二，强调对践踏人权者进行制裁追责；其三，将“无条件释放香港政治犯”置于突出位置，并以“光复公义，自决未来”作为号召语。宣言试图把香港议题从“地方争议”重新放回“国际人权与制度责任”的框架之中。

研讨会期间，来自声援团体的代表发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强调，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

主张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香港人提出政治诉求，应当被尊重与保护。他同时回顾港人多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指出《国安法》后自由空间坍塌，是推动新一轮流亡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在现场也作了临时发言。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流亡者，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香港自民党成立，不是仪式，是香港人拒绝被消音的宣告。创党宣言讲得很清楚：第一，无条件释放所有香港政治犯；第二，对践踏人权者制裁追责；第三，香港必须走向自决未来，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命运。中共撕毁承诺、以恶法镇压香港，这不是治理，是清算。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让世界继续看见真相、继续行动。”

发言结束后，会场短暂安静了一秒，随后掌声响起。那不是热闹的掌声，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彼此仍在，确认这件事还值得被讲，确认“未来”不是被允许才拥有，而是要靠行动去争取。

对外界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海外集会；但对经历过恐惧与噤声的人而言，它更像一次“重新把话说出来”的练习——把宣言、诉求与行动路线摆上桌面，接受质询，也接受记录。香港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一场活动而改变，但至少在这个下午，有人选择不再把香港当作过去式。



中国民主党党员梁振华对香港自民党发起人廖文浩提问



中国民主党党员冯仍现场发言

On the Founding of the Hong Ko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t a Los Angeles event, exiled Hong Kongers founded the Hong Ko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rejecting enforced silence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restoring political voi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advocacy, accountability for abuses,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a renewed claim to self determin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第 39 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野党》记者 侯冰峰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出席嘉賓理事與前任會長合影 攝影記者 廖育

【旧金山讯】2025年12月28日下午，第39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行。来自全美各地的民主人士、学者及社会活动人士出席活动，共同表彰在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背景及由来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设立，自1986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至今已连续举办39届。该奖项旨在表彰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及社会进步的个人与行动者。历届获奖者多为在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民主及社会运动人士。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总部设于旧金山。基金会由黄雨川、郭台鉴、杨云、孙鲁正、梁冬、江文、林剑明等民主人士共同创立，组织成员均为志愿者。基金会通过公民教育、奖励机制及公共倡议，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与人权发展。

三位获奖人士的名单及英勇事迹

本届评选委员会由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经过提名与评议程序，最终评选出三位获奖者，分别为香港民主运动代表何桂兰女士、大陆公民记者张展女士以及中华民国台湾政治学者明居正教授。三位获奖者分别来自香港、大陆与台湾，虽处不同地区，却在中共极权扩张与自由倒退的背景下，选择坚持公共良知与民主价值。

评选委员会指出，明居正教授是华人世界知名政治学者与评论家，长期就中共政局、两岸关系及民主议题

发表分析，其言论坚持以历史事实与理性逻辑为基础，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中持续发声，具有重要公共价值。

何桂兰女士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象征人物之一。她因参与民主抗争活动被判刑入狱。评选委员会表示，何桂兰以个人行动展现了香港社会对自由与法治的坚守，其精神影响仍在持续。

张展女士为前律师、公民记者，因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独立记录并发布现场情况而受到关注。她多次因相关行动被判刑入狱。评选委员会认为，张展以个人代价坚持记录公共事件，体现了对真相与人权的高度责任感。

设立“杰出民主人士奖”的使命和意义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表示，设立“杰出民主人士奖”的核心理念在于推动公民教育，强调权利与责任并重。基金会认为，民主社会的形成不仅依赖制度设计，更有赖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担当。三位获奖者中，一人身陷香港狱中，一人被关押于中国大陆，一人身处台湾承受政治压力。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共同展现了在黑暗中坚持点亮民主与自由之光的勇气。

颁奖典礼最后，与会者向仍在狱中或承受压力的民主人士表达声援，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及香港的人权与自由状况。

China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Awards the 39th Outstanding Democracy Advocate Prize

On December 28, 2025, the China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held the 39th Outstanding Democracy Advocate Award ceremony in San Francisco. Honorees He Guilan, Zhang Zhan, and Ming Juzheng represent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award recognizes their sustained courage and public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amid repression, imprisonment, and political pressure, and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support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铁链女事件 4 周年：这是“国家犯罪”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自由雕塑公园 Liberty Sculpture Park

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在2022年1月上旬。不是因为执法部门接到民众的报案，也不是例行性的排查发现，而是一位自媒体播主的偶然到访，才让一个被铁链锁住脖子的人，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那一刻，世界才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女人被拐卖、囚禁、虐待、性侵，被迫生下8个孩子，在炼狱里被折磨了24年。

这24年，横跨了两个时代：从1998年依赖BP机(寻呼机)与有线电话的落后年代，到2022年高清摄像头密布、手机与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

根据当时曝光的零碎信息，只要稍作想象，便令人背脊发凉。铁链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24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始终无法向外界求救。村里、乡里、镇里，一定有人知道她是被拐来的，也一定有人见过她被铁链锁住，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果说这是个别人的冷漠，那已经足够可怕；但当这种沉默持续了24年，它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共犯。

事件曝光后，仅一两个月时间就引发了超过40亿人次的关注，这是一个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讨论规模。就连隔岸的日本NHK、《朝日新闻》及一些国际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甚至录制专题节目对事件进行讨论。

但最终结果是：真相没有完整公开、调查过程不透明、责任被限制在极小范围，而她本人，至今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尊严。

四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改变了吗？没有！四年后的今天，监控摄像头更多了，技术更先进、成像更高清了，但妇女、儿童依然在失踪，依然有人无法被找回。

徐州铁链女不是孤例，她只是被偶然发现的那一个。这不是个案悲剧，而是政治问题，是与你我每一个普通人有着切身相关的“政治”。

如果将政治理解成官员任命、外交决策、投票选举或宏大叙事，那其实是执政者对民众的误导，让普通人认为：“政治离我很远，我没必要关心。”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作写道：“All your, our, your / daily and nightly affairs / are political affairs...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 your genes have a political past, / your skin, a political cast, / your eyes, a political aspect.”在这个意义上，铁链女事件就是最赤裸、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一个政权，在24年里无法发现、无法解救一个被囚禁的女人；在40多亿人次关注之下，仍动用权力封锁信息、压制调查、切断问责；在事件曝光四年之后，依然没有制度性改变。这已经不是道德失范或基层腐败的问题，而是“国家犯罪”(State Crime)。

2026年1月4日，湾区圣何塞。

阴雨寒冷的冬日里，我们站在市民中心，纪念徐州铁链女事件四周年。四年过去了，真相依旧残缺，自由依旧缺席。我们选择在这里，不是因为事情已经解决，而是因为它从未真正结束。

记住徐州铁链女，拒绝遗忘！当国家本身成为施加伤害的一部分，沉默就不再是中立，而是共犯。



2024 年铁链女事件两周年，Times Square, New York



2026 年 1 月 4 日铁链女事件 4 周年，San Jose City Hall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Xuzhou Chained Woman: This Is a State Cr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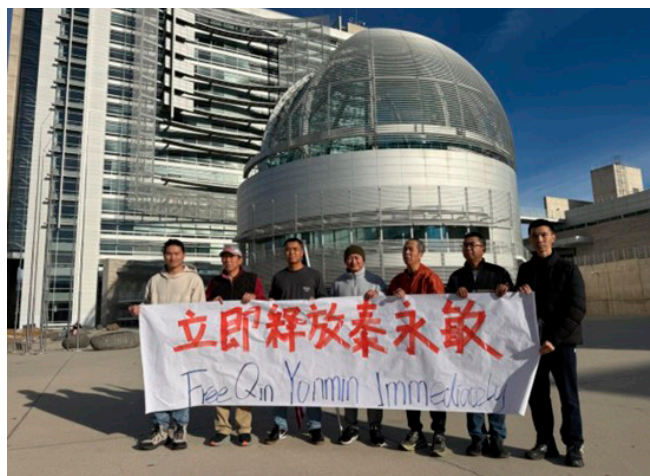
Four years after exposure, the victim remains without freedom or justice, investigations stay opaque, accountability is blocked, and systemic silence reveals a crime enabled and sustained by the stat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勿忘民运先驱 呼吁中共释放秦永敏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1日下午，一场以“声援秦永敏先生，呼吁中共释放秦永敏”为主题的集会活动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政厅前举行。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旧金山分部的李海风、张勇、李涛发起，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中国良心犯的处境。

活动主持李海风在发言中介绍了秦永敏的个人经历。他指出，秦永敏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坚持民主理念和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及组党的基本权利，秦永敏数十年来反复遭到当局打压，包括传唤、监视居住、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以及多次判刑入狱。秦永敏曾公开表态“中国不民主化，不出国”，并拒绝以流亡换取个人自由。自1970年至2012年的43年间，秦永敏被抓捕、拘禁39次，累计服刑23年，被认为是邓小平时代以来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

除主办方成员外，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清，以及民主运动活跃人士袁强、杨坤等也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并发表讲话。

多位发言者在演讲中共同强调，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先驱人物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他们不应被遗忘。发言者指出，当前仍有大量政治犯仍被中共当局囚禁，而身处海外、相对安全环境中的人士更有责任为他们持续发声。与会者表示，此次声援活动不仅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记住秦永敏的名字，也希望通过公开集会的方式，向中国境内的政治犯传递一个信息：流亡海外的同道并未忘记他们。正如多位发言者所言，“如果我们在安全的地方都不为他们

呐喊，那将愧对这些为民主付出自由乃至一生的先驱。”希望这些来自海外的声音，能为身处图囿中的人带去哪怕一点点精神上的温暖。

活动尾声，主办方延续“每人一美金，捐助国内良心犯家属”的募捐行动，现场呼吁与会者为已故良心犯王森的家属提供经济援助。本轮筹款目标为3万元人民币，约合4300美元。

据介绍，王森因长期服刑，前后入狱十余年，出狱时身体状况已严重受损。在贫困与疾病交织的境况下，他生前仍背负约3万元人民币债务，直至去世也未能偿还。该募捐金额正是用于帮助其家属偿还这笔遗留债务。主办方表示，有关王森的事迹信息来源于民运前辈朱虞夫先生，公众亦可通过公开渠道自行检索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目前，活动组织方已与王森家属取得直接联系，并承诺在筹款活动结束后，将善款如数转交其家人。同时，主办方欢迎社会各界参与捐助，并对善款流向与核实过程进行公开验证，以确保整个捐款过程的真实性与透明度。

Remembering a Pione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Qin Yongmin

A rally in San Jose urged the CCP to release veteran political prisoner Qin Yongmin, remember early democracy pioneers, and support families of conscience prisoners through continued public advocacy and transparent fundraising effor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声援伊朗人民反抗暴政 - 揭露中共专制输出的全球危害

—— 旧金山民运人士在中共领馆前集会抗议

作者：《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202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声援伊朗人民持续进行的反政府抗争，并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伊朗镇压民众过程中所扮演的“专制技术后台”角色。

此次集会以“声援伊朗人民自由抗争，声讨邪恶后台独裁中共”为主题。参与者在旧金山中共匪领馆门外集结，手举中英文标语，高呼“Free Iran”“Azadi! Azadi! Azadi!”以及“Take Down CCP”“Take Down Khamenei”等口号，明确将伊朗神权体制的血腥镇压，与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专制治理模式联系起来。

伊朗抗议浪潮：长期压迫下的再次爆发

自2025年末以来，伊朗多地再度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表面诱因各异，但根本原因高度一致：长期的政治高压、经济濒临崩溃、青年失业率高企、女性与少数民族遭受系统性歧视，以及对言论、信仰和人身自由的全面剥夺。

伊朗当局延续其数十年来的治理模式，以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准军事力量直接介入镇压，动用实弹、夜间抓捕、酷刑审讯、快速审判乃至死刑威胁来压制社会反抗。同时，多次实施全国性断网与通讯封锁，试图切断信息传播链条，掩盖镇压规模与真实伤亡情况。

多家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镇压并非临时应对，而是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暴力，其核心目的不是“恢复秩序”，而是通过制造恐惧维持政权生存。这种逻辑，正是当代威权专制体制的共同特征。

中共的“不可见之手”：威权合作的现实样本

多位发言者在现场强调，伊朗政权的残酷统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跨国威权合作网络之中。在这一网络里，中共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近年来，中共不仅向外输出资本与基础设施，更系统性地输出一整套“高科技镇压方案”包括监控体系、网络审查、信息封锁、数据追踪与社会控制模型。这些技术与经验，已在伊朗得到现实应用，使镇压更精准、更高效，也更难被外界察觉。

缪青：专制正在合流，自由必须结盟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先生在集会上发表发言指出，声援伊朗人民并非地缘政治立场选择，而是基本价值判断。

他强调，伊朗的高压统治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而是全球专制合流的一个前线案例。“在伊朗神权政权背后，已经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邪恶后台：中国共产党政权。”缪青指出，中共不仅在国内系统性镇压人民，也正在将监控、维稳与恐惧治理的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缪青表示，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极权、并因此被迫流亡的人，中国民主人士有责任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一个事实：今天如果对伊朗人民的血腥镇压保持沉默，明天就无法阻止专制政权之间继续相互扶持、相互复制。

“专制政权彼此声援，自由的人就更必须彼此站在一起。”他说，“沉默不是中立，沉默是在为邪恶让路。”

陈森锋：镇压技术输出必须被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先生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了中共介入伊朗镇压的多项公开事实。

他指出，多方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与情报来源已经披露：中国制造的监控与人脸识别设备，被广泛部署于伊朗街头，用于识别、追踪和抓捕抗议者；中资安防企业被指直接向伊朗军警及革命卫队提供监控系统；疑似中国来源的军用或军民两用物资，在运往伊朗途中被美方拦截；伊朗在全国断网、干扰卫星通讯期间，使用的复杂电子战与信号干扰技术，被专家怀疑来自中俄支持；中共官方在外交与舆论层面，持续为伊朗镇压行为辩护或保持纵容立场。

他强调，任何向独裁政权提供武器、监控技术与镇压工具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罪行，必须被追责清算。

何聪：让真相突破断网与封锁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先生在发言中，呼吁公众利用自媒体与社交平台传播伊朗正在发生的暴行。他指出，伊朗当局切断网络，正是为了阻止世界看到真相。

“我们每一个看到伊朗屠杀人民消息的人，都应该转发出去。”何聪说，“只要坚持，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压死骆驼的稻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丢上去的那一根。”

卫仁喜：这不是骚乱，而是国家暴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先生指出，今天伊朗发生的不是“骚乱”，而是国家对人民的系统性暴力。断网、夜间抓人、当街开枪、快速审判与重刑威慑，清楚表明政权已丧失通过合法性治理社会的能力。

他强调，伊朗并不孤立，而是处于一个以镇压人民为共同特征的“威权轴心”之中，而中共在外交、经济与技术层面的长期支持，客观上增强了伊朗政权的镇压能力。

孙诚：伊朗神权政权是成熟的反人类体系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在发言中，从历史纵深系统揭露了伊朗神权政权的反人类本质。他指出，自1979年夺权以来，该政权通过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系统性谋杀异议知识分子、残酷镇压女性与宗教少数群体，建立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暴力统治体系。

孙诚回顾，1988年伊朗当局曾一次性处决约三万名政治犯；在此后数十年中，多次民主抗议浪潮均遭血腥镇压。近年来，伊朗更与中共、普京集团深度捆绑，构成新的威权轴心，在中东、欧洲与亚洲多地制造战争、恐怖与人权灾难。

他强调，伊朗对基督徒、巴哈伊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已经构成持续性的反人类罪行，而这种政权之所以得以存续，正是因为获得了威权盟友的现实支持。

结语：自由的敌人正在结盟，自由的人必须如此

集会最后，与会者再次高呼“Azadi! Azadi! Azadi!”这一伊朗民主运动的象征性口号。主办方表示，此次行动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声援，更是对全球威权合流趋势的公开警告。

当独裁者跨越国界、共享镇压经验时，自由世界若继续沉默与妥协，代价将由无数普通人承担。

枪口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愤怒，但永远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任何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秩序，终将崩塌。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缪青，崔允星，孙诚，庄帆，李树青，陈森峰，高应芬，卫仁喜，卢占强，蒋书清，国盼，陈光升，何聪，马力，唐奇，吴志创，刘玉（排名不分先后）

摄影：缪青 蒋树清



在纪念与抗争之间：方鹊女士的民运之路

作者：方鹊
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钟然 翻译：Gloria



中国民主党人方鹊女士愤怒声讨中共的暴政，为六四的无辜受难者讨回血债。

Ms. Fang Qu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has repeatedly and angrily condemned the tyran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eking justice for the innocent victims of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At every memorial event for political victims inside China, Ms. Fang Que can always be seen at the scene of solidarity actions. She also serves in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每当在国内政治受难者的纪念日，总能在声援现场看到方鹊女士的身影，她还兼任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宣传部门工作。

Whenever anniversaries commemorating domestic political victims are observed, Ms. Fang Que is almost always seen at solidarity events. She also serves in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Alliance.



方鹊女士在新落成的“中国民主运动先驱墙前凭吊逝者、仰望先驱，决心继承前辈的未竟之业，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做好国内民运的后援工作，随时把火种带回中国。

Standing before the newly established “Wall of Pione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Ms. Fang Que pays tribute to the deceased and looks up to the pioneers, resolving to carry on the unfinished work of her predecessors. On this land of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is determined to serve 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the domestic democracy movement, ready at any time to bring the spark of freedom back to China.



担任《在野党》采访部工作重任的方鹊女士，在活动现场做摄录，留下历史记忆，并将海外民运对国内民主的关切通过互联网投向中国大陆，让同胞可以翻墙看到。

As a key member of the interview department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Ms. Fang Que undertakes filming and recording duties at events, preserving historical memory. Through the internet, she conveys the concerns and voices of the overseas democracy movement to mainland China, enabling compatriots to see the truth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blockade.

我们是谁：民主中国阵线

——一段仍在延续的民主思考

文 / 陆乾坤《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我们是**民主中国阵线**（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简称民阵）。

我们诞生于1989年之后。那一年，中国民主运动遭遇全面镇压，大量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枪声与鲜血尚未散去，现实已经迫使人们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抗争失败了，民主是否就此终结？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为何存在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之初，并未选择以街头行动或组织动员作为主要方向。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民主问题并不只是“反对什么”，更是“未来如何建立”的问题。

因此，我们选择成为一个以思想、讨论与制度反思为核心的平台型民主组织。

我们并不追求统一立场，也不要求成员观点一致。相反，我们认为：

允许分歧、容纳争论，本身就是民主实践的一部分。

二、我们坚持的原则

在长期的讨论与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并不激进、却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

- 民主不是口号，而是一套需要反复论证的制度
- 反对极权，不等于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 反对暴力政治，也警惕情绪化革命
- 中国民主，必须能够回答“转型之后怎么办”

这些立场并不讨巧，也不容易赢得掌声，但我们相信，它们是通往成熟民主不可绕开的部分。

三、我们做过什么

多年来，我们的工作并不显眼。

我们持续发表政论文章，讨论宪政、法治与权力制衡；

我们举办研讨与讨论，反思中国民主运动的经验与失败；

我们保存历史记忆，整理文献，为未来留下真实记录；

我们与国际社会交流，也不断进行内部反思与批评。

这些工作无法立刻改变现实，但它们让中国民主思想没有中断。

四、关于低潮与失败

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漫长的低谷。

有人被囚禁，有人消失，有人老去，也有人选择离开公共政治。

我们不指责这些选择。

但我们选择留下。

留下来，是为了让后来者知道：

中国民主并非从今天才开始；

你们也不是从零起步。

五、面对新一代

在新的抗争浪潮出现后，我们看见了熟悉的勇气，也看见了熟悉的迷茫。

我们并不试图成为“导师”，
更愿意成为一座桥梁——
连接不同世代的经验、代价与思考。
如果我们的存在，能让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
如果我们的讨论，能为未来多留下几种可能；
那么，这段坚持就有其意义。

结语

民主中国阵线不是一个宏大的工程，
更不是一个即将完成的项目。
它是一段没有掌声的长路。
我们不知道终点何时到来，
但我们相信：
只要仍有人思考，中国民主就尚未失败。

民主中国阵线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官方网站：www.fdc64.org

国际合作联络：info@fdc64.org



民阵主席：秦晋（澳大利亚）



民阵副主席：金秀红（美国）



民阵副主席：盛雪（加拿大）



民阵副主席：王戴（日本）



民阵副主席：张健（法国）已去世

民主党人陈西的投诉状与建议

作者：陈西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一、诉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二、希望国家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完善并执行相关法规 三、关于包容性社会的建议

一、投诉

投诉人：陈西，男，72岁，身份证：520102195402286615，无业，公民学者，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龙昌苑7-2-23-1，手机号：18198281954；宅电：085184776400

投诉单位：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法人）

投诉案由：2024年停止了本人领取养老金，且不予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

请求事项：恢复本人自2022年7月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核定过的标准，核准本人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近20年工龄，和退役军人优待证福利的权利。

事实与理由

本人陈西，于2003年9月开始交纳个人养老金，至2022年7月，共交纳了220个月，于2022年的8月开始领取核定每月1663.82元的基本养老金。谁知，领至2024年的8月，突然不见再发给我养老金，于是，本人到贵阳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根据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黔劳社厅发（2006）26号1006年8月9日）文，第四条第一款，参保人员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的养老金问题，处置本人，取消本人的养老金发放。工作人员还拿出已经被处理的数百份材料给本人看，说这些都是根据这一条款被取消养老金的。同时指出：本人已经领取的养老金43329.03元，必须全部追回。本人从2011年12月26日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贵州省兴义监狱服刑，服刑期间不能交养老金，交了也无效。

本人提问：受害人不知道有这个规定，交时也未得到告知；再说此文是2006年发的，我是在2003年开始交的；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本人也领取养老金两年，怎么现在才出现“交了也无效”的决定。

工作人员回答：过去一直有文，只是未能普及宣传，加上人手不够，我们是事后发现一例再处理一例。

只是，“事后处理”的工作方法，让受害者彻底返贫

了。而法律原则：法不溯及过往。法律已经惩罚追诉过的就不再重复追诉。然而，地方文件事隔多年后，又再次要惩罚追诉，显然是违背法律原则的。本人因受到处罚，成为了“三无人员”：无收入来源、无劳动力、无任何生活保障者（社保、医保，低保，舍保都没有），并且，还欠了社保机构近五万元债务。小康社会的今天，国家的基本保障制度怎么成了制造重返贫困的制度？

有网友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对“三无人员”有社保、医保，低保等等的保障，资本主义国家讲契约精神。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对“三无人员”的保障，和契约精神当显示出来。如：本人从1970年至1989年在国家事业单位的工龄工资，因服过刑也当算数，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

法治社会讲：公民纳税了就是纳税人，就应当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业是现代社会一项普遍的社会福利，陈西花钱购买了社会保险却在路途中被另类区别对待，是有违法治社会之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第三条 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及习近平在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召开之际还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而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红头文件则与此相反；可以说，其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与国家政策相冲突，与执政党理念相冲突的不合法文件。

二、希望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遵守国家法治，并执行之

1、国家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本人是否共和国公民，地方的红头文件是否有权取消本人的公民资格？服刑期间，本人的公民资格监狱都无权取消，回归社会反而被取消，这样的地方法规合法吗？

常识告诉我：公民资格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位格，任何个人、社会组织，甚至某个国家机关都无权取消宪法明确的公民资格。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国家社会保险法第三条，以及执政党一再强调：“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基于此，本人从1970年至1989年在国家事业单位的工龄工资也当算数；最近，日本本田公司撤走，就是根据工龄补发工资的。况且，本人还尽力交纳了220个月的养老金，属最低档的养老金；本人很不想给家庭、社会、国家添加负担，却被地方红头文件否决，致使本人成为了“三无人员”和欠债人，被迫给家庭、社会、国家添加本可避免的负能量。

常识告诉我：国家上位法高于地方政策，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遵守上位法。一个国家的保障制度是国家和公民在个人生活保障上相互承担的责任。公民必须分担的，由公民分担；国家必须分担的，由国家分担；公民尽了最大责任不能分担的，由国家分担。这体现了现代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和包容性。

现代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和包容性体现在“普惠性”上：即保障对象的普遍性，一切公民平等的分享国民待遇；体现在“基础性”上，即以人民群众为基本需求的保障内容，国家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的贯彻上；体现在“兜底性”上，即在风险社会中，政府有承担民生兜底性保障的国家责任。由于单纯以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无法完全抵御社会的或自然的风险，且慈善与互助亦难以提供足够支持；作为现代性国家，就必须承担起构建合理的保障制度，以确保公民获得合乎人性尊严之基本生活所需的责任，引导个体人格的自立、自主发展，实现和确保国民的平等发展权。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是现代包容性国家建设的要求，或者说，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是国家存在的政治学责任，其理论源于对成立国家的认同。从古希腊发轫政治学以来，认为，国家是善和道德的化身。人们成立国家是为了善和道德的目的，决不是为了造恶或搞歧视目的；这种目的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国家行善和道德的目的是中性的，不会有歧视性或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如，国家决不会因人而异，因民族性、性别、贫富、地域、阶级性、好人或坏人、罪人或优秀者来选择其国民，承载其国民；不论这个人怎么样，国家都会一视同仁的承载。用著名政治哲学家波普尔的话说：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是谋求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建立美好的幸福生活；而是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就是说：国家只做“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低端，中性，平台的事；而中端、高大美的善事留给社会团体和个人去做。

然而，贵州地方政策在贯彻国家责任时，不坚守低端中性，平台的事项，反而好高骛远求高端意识形态的偏好，视好人坏人、贫富、地域、阶级性、罪人与优

秀者来承载；严重歪曲了国家的性质。无形之中，国家做了它不该做的事，办了它不应当办的项目，其必然会造成严重恶果。比如，我会问：国家不做兜底性平台的事，谁来做？

3、因地方政策选择性执法，造成了本人成为“三无人员”和负责人。这反映了在保障制度中，民生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个人主体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制度构建仍未成型，家庭与个人成员之间主体关系责任依旧模糊，这限制了确实需要获得救助者得不到救助。如本人因不符合“社会救助法”中，第十五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第十六条【特困人员】标准。而该条款是一个踢皮球的条款，是不尊重个人主体性责任，更不尊重个体当有人格尊严的条款。从而，国家未承担起确保公民个体获得合乎人性尊严之基本生活所需的国家责任，实现和保障国民平等发展权的国家任务，让国家责任出现了“破口”。

本人一家三口，妻子与女儿，一个有三千元的退休金，一个约有五千元工资，因此，不符合第十五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第十六条【特困人员】标准。不符合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中国旧传统的王朝文化不扶持个人主义，而是打压个人主义，导致整个国家个人的责任心缺失。本人的责任心就遭致上述条款的打压，该条款取消了个人尽自己责任的努力，转嫁本人生活负担给家庭，要本人去吃喝家人极其有限的资源；如此的窘境，造成本人在家里成为一个失去人格尊严，每天得仰人鼻息生活，像个多余的人。可要知道，人性在哪里都是“嫌贫爱富”的，地方歧视性政策是一部繁衍出一个又一个家庭矛盾和家庭悲剧的政策；本人因受地方政策的歧视，造成了家庭的不睦。我要问：地方红头文件是一份人为潜意识制造家庭不睦矛盾的政策吗？与国家保障性平台的匹配在哪里？小康社会生活在哪里？

4、国家一再重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搞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而贵州地方性政策正在违反此精神。除了因刑事事由外，地方性政策还暗地里清算了本人作为退役军人当得到的国民待遇。

根据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五条，关于军人退役人员的视同缴费年限问题，原军龄视同缴费年限，并与参保缴费后的实际年限合并计算。

当本人问及这一条款时，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更具体的（在暗箱里的）操作文本规定，凡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的，一律取消该项待遇。之所以指“暗箱操作”，当本人要求看看文本时，竟不让看。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政策开了一个坏头，紧接着，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文件《贵州省特殊情形人员优证申请发放实施

办法试行》2023年2月6日文，也在与包容性国家建设背道而行。该文第12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刑事处罚的，不能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当本人在接受完法律处罚后，去办证时被告知，这是内部文件，社区工作人员也看不到，只被传达，要求执行。这样的地方红头文件比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歹毒。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有个惩罚的有效期限，和底限，而地方的红头文件却没有这个期限，和底限；一旦受到处罚，将永远遭受处罚，永远遭受歧视，永远决不宽容，地方红头文件是典型的极端主义政策。

看来，地方的土政策比国家法律法规更威风，在这种政策的盘剥对待下来，本人真是要被地方土政策开除球籍了。本人很想问：本人的公民资格还存不存在吗？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已经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了！服兵役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本人尽了作为公民当尽的义务，保家卫国，不计薪酬，不计艰难困苦和牺牲，在军队里服役了N多年，结果，因受到刑事处罚就不承认，永远取消了本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曾经有过贡献的待遇。

本人要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里有“决不宽容”含意吗？法律惩罚就意味着永远取消公民资格吗！这不是在否定国家绝对善的目的，绝对爱的存在吗！普惠包容的国家责任是：“一个也不能少”。不论你是好人或坏人，罪人或非罪人。

近日，共和国外交部王毅部长在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对话时，敦促塔利班政府要建立包容性政府，中方才可伸出友谊和援助之手。贵州的地方政府也应当接受王毅部长的敦促！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理性包容伙伴性关系中的，不是建立在非敌即友、好与坏，相互仇视关系中的。所有人权利一律平等，他有权从社会整体利益那里合理地分享其基本成员的一定份额，这是社会的技术和各种力量组合所能提供给他当有的利益。

如果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中，而是建立在相互歧视关系中，这样的政策是不把人当人看，每一个人都会是受害者，会成为专制的对象；如此，每一个人会因失去向上健康生活的方向，退而颓废的走向哪个不归之路。这种阻断了可以走向悔过自新世界的作法，世界会受到诅咒，世界将转向了那个疯狂、不和谐、恶毒、混乱，和枉然受苦无可救药的敌对世界。现代性国家建设将不可能实现，甚至终将失败；自然秩序会受到违抗，世界文明将荡然无存。基于此种忧虑，本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三、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建议

国家绝对善的功能指国家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功能的存在。国家处罚性功能指国家有处罚不公，维

护社会正当秩序的责任。所有公民都应当知晓，自己在保障与处罚悖论性关系中。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其中的真谛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保障，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所以，大部分政策是为防止政府滥用职权，为保障基本公民权利而制定，决不是为歧视公民权利而制定；同时，我们也承认，有极少部分法规是为处罚不当行为而定。记住，是处罚行为，不处罚思想。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制度是保奖公民发声，鼓励为国家提出好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制度，决不是坏制度。坏制度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有爱国心责任心人的制度。因此，在坏制度那里有思想犯，坏制度视思想异议人士为敌人。

保障与处罚都关系到生存权问题，生存权是基础性的权利；因此，保障与处罚不能危及到个人生存权。也就是说，国家的保障与处罚功能在维护社会公义时，其功能不得制造不公，不能制造贫困，打击个人责任心，和敢于创新，敢于提出新问题的人，更不得有违背溯及以往的法律原则，犯不断重复追诉的恶意；在此基础上，国家才可以去处罚罪行，追求社会公义。

1、本人并不否定“事后处罚”。如在涉及经济犯罪行为，除了没收其违法所得外，经济上得加大处罚力度，就有“事后处罚”；而“事后处罚”是有边界的，其边界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框架外，开展差异化的处罚。至于非经济类案件，财产是正当所得的，就当保护其产权（本人属非经济类案件）。国际法学称刑法执行“自由刑律”。即处罚是以剥夺受刑者的人身自由为主，而经济上的受损是一种非人为连带行为。如果法律允许，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非经济类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也可以用经济上补偿的办法来减轻其后果；但是，这得征求当事人同意，在当事人自愿同意的前提上，可涉及经济赔偿类的处罚。

2、处罚的力度。处罚的力度得控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红线之外；不得再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者思维。如：彻底撤消本人的工龄和服役规定的福利待遇；追缴非法所得考虑具体人，或其亲属牵连者，被处罚者曾经的正当所得。比如他们的遗产、亲人的正当性收入都不在被处罚内；也不在计划涉及处罚的范围内。要有物权法意识，物权法意识要求避免极端性制度处罚制造的新无产阶级赤贫者出现。“无产阶级”是一个极端国情下才有的概念，“无产阶级”是一个非正常的阶级，正常国家应当避免制造新的“无产者”。

中国上千年打江山，坐江山的王朝文化遗毒里充满着猛兽的决不宽容，赶尽杀绝，其严重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和有缺乏怜悯之心的缺陷；如，历朝历代都有“株连九族”无限打击，“抄家”“痛打落水狗”的运动就体现了

这种缺陷。本人只因是一名异议人士，公开的反对派就遭受到了王朝文化“痛打落水狗”的迫害。这种王朝文化残酷冷血斗争的劣根性还遗留在“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和“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红头文件里，它已经让N多人及其家庭受害。

3、功过的区别。功是功，过是过；功不能抵过，过也不能涉及功。处罚不能把一个人彻底给毁掉，功劳也不能包揽了一个人的一切。要忌极端主义王朝文化决不包容的恶意，摒弃王朝文化劣根性塑造的思维：成则王，败则寇；不成龙，就成虫；不作主人，就作奴隶；人在社会中，只有在革命与奴役两端进行选择，只能首鼠两端的生活，没有中间公民性的位格；这种国情不利于民族自生的发展，不利于人类社会彼此之间合作精神的涌现。

如：本人曾经有过服役的荣誉，“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红头文件是可以在法律处罚期间取消该荣誉下的优待证的。优待证可以取消，“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国民待遇不能取消；而当法律处罚完毕时，地方的红头文件也当恢复一个公民荣誉下的优待证。但是，地方的红头文件却彻底取消了一个公民曾有过的荣誉下的优待证，永远取消了一个公民的国民待遇。希望地方当局恢复一个退役军人，普通公民当得到的国民待遇。

4、国家法律法规不当打击个人主义精神，而是要保护个人主义精神。因为，没有个人主义精神就不会有个人责任心。“一个都不能少”指的是保护个人主义。而“社会救助法”中，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标准，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里是以家庭为最小单位；实际，人类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建议：国家法律法规确定个人为最小单位。在此基础上，可否得救助，可先征求个人意见，再征求家庭的意见进行救助。

综上所述，它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建设。行政法规不能违法违宪，行政法规的奖惩要考虑到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法理和法律的中立性决定了，法律只关注个人，关注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不关心集体主义及其利益；法律是从点滴用功积小成大，去巩固整个社会的福祉。如果法律关心集体主义，现代国家建设将不可能成立。这除了存在可操作性难题外，当一个群体掌权时，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偏心于己方，创立一部偏向自己的恶法去恶意对待其他群体，歧视压迫剥削其他群体；这样的恶法没有中立性，只是某统治阶级的工具；当另外的群体上台执掌大权时，又会制定一部偏向己方的恶法，推翻过去统治者的恶法，法律仍然是工具，不是不同群体认同普适的规则。一但视法律为巩固特权的工具，不是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普适规则意识盛行时，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特权的地方一定是个野蛮的社会，文明社会撤消特权者制定的政策。

愿这一投诉状与建议能够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建设，

促进文明社会在贵州的落地，促进新的“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和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得到恰当修改面世。

此致

呈：国家信访局政务投诉与建议平台

投诉状与建议人：陈西
2025年12月25日星期五



1、陈西释放证复印件



2、陈西养老金核定表



3、陈西养老金违规承诺书复印件

八九学潮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八九学潮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事件。事件起因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北京高校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并逐渐提出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与政府对话等诉求。随着参与人数不断扩大，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使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多座城市。

5月中旬，学生绝食将运动推向高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6月3日至4日，军队进城并对示威人群实施武力清场，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但具体数字至今未有公开透明的官方统计。事件结束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趋于收紧，相关讨论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国际上，中国一度遭遇制裁与外交压力。

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政治走向，也成为全球范围内讨论中国人权、社会转型与政治改革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节点。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 谢长发（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吕
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轮值总编辑：Gloria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部长） 李晶（副部长） 钟然（副部长） 张娜（副部长）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胡丽莉 程伟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刘敖（常务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收稿部：马群（部长） 彭小梅（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 李建伟（副部长） 邢致远 卢超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校对部：冯仍（部长） 熊辩（副部长） 程筱筱（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翻译部：彭小梅（部长） 吕峰（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周敏 戈冰

采访部：巫伟杰（部长） 林小龙（常务副部长） 缪青（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方鹊 宋娟华 瞿成松 Cooper Guan [旧金山记者站]：缪青（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Gloria（部长） 彭硕（副部长） 曾群兰（副部长） 何愚（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人权观察部：安浦（部长） 张维清（副部长） 黄吉洲（副部长） 何愚（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 赵杰（副部长） 林小龙（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房兰峰 汪洋 Rong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 高晗（副部长） 朱小砚（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部长） 张宇（副部长） 陈婷（副部长）

档案部：侯改英（部长）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宝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在野党》12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额 (USD)
12.01.2025	LiangJiang Wang	捐助乌克兰	\$1000.00
12.15.2025	JingHui Chen		\$2000.00
12.22.2025	Jing Li		\$100.00
12.24.2025	LiangJiang Wang	捐助乌克兰	\$1000.00
12.26.2025	XiaoLiang Peng		\$100.00
12.31.2025	Que Fang		\$1000.00
12.31.2025	LiangJiang Wang	捐助乌克兰	\$500.00

幕 后 团 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 誉 墙



胡海宁，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自《在野党》复刊以来，长期负责杂志整体版式体系的建立与维护，涵盖页面结构设计、视觉规范制定、印刷适配与出版流程协调等工作。

在杂志制作过程中，他承担从初稿排版到最终出版文件输出的全流程工作，确保不同作者、不同语种内容在同一刊物中保持统一的视觉秩序与阅读逻辑。其工作直接关系到杂志的整体完成度与出版稳定性，是《在野党》能够持续、按期出版的重要保障之一。



曾群兰，《在野党》杂志社宣发部副部长，长期参与杂志对外传播与公共议题表达工作。其工作重点包括对外信息发布、内容传播协调及舆论环境下的表达策略支持，协助推动杂志在不同平台上的持续发声。

在宣发工作中，她注重议题表达的清晰性与一致性，强调对专制体制的理性批判与对民主价值的明确立场，致力于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维护《在野党》的公共立场与传播方向。

郭飛雄（楊茂東・1966－） 中國人權捍衛者，良心犯

他以法律為盾，為真相與權利而立；以文字與行動，為弱者與自由作證。因堅持公義多次入獄，最新一載八年牢獄，健康在獄中消磨，却不曾放棄他對民主、法治與人權的信念。他是當代中國良知的守望者，是黑暗裏拒絕沉默的聲音。

注：“郭飛雄”之名，取自百漢俠士郭解之“郭”，寓意為弱者伸張正義；“飛雄”象徵衝破壓迫、以膽識守護良知。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他選擇的道路。

